

# 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10年05月

##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 [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
- 6、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独立阅读网下载：<http://chinairr.com.cn>。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轮值编辑：**言一

**观察员：**文学：朱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一（香港）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晓骥（北京）、贾葭（北京）、张无极（北京）、罗四鸽（上海）、扬克（德国·图宾根）、孙传钊（上海）、燕舞（北京）、灵子（北京）

**翻译：**陈丹丹（英国）、吴万伟（武汉）、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 编者按：

40年前的3月15日，邻国日本在大阪举办了亚洲首个世博会，距离之前的东京奥运会不过6年；更为有趣的是，大阪世博会的主题亦被定为“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仅过了5年，世博会便再次在冲绳举办，彼时日本经济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等到日本第三次举办世博，却已距大阪世博足足35年。

正如日本学者吉见俊哉在其为《博览会的政治学》所作的新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北京奥运与上海世博的这一组合，看上去与四十多年前东京奥运与大阪世博，以及二十多年前首尔奥运与大田世博的组合十分相似——奥运与世博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国家经济增长的象征。在他看来，这样一种极为一致的象征，以及这种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都是颇值得以比较研究的视角来加以探寻的对象。而当我们视野退回到世博会诞生之初的英国和在初期大放异彩的法国，则更是为审视眼下的上海世博增添了宽广的历史纬度与拓出了足够的凝视空间。

于是，无论是吉见俊哉写于日本泡沫经济尾声的《博览会的政治学》亦或大卫·哈维成书于2001的《资本的空间》，都显得如此的生逢其时。（注：两书中文版均在5月中由台湾群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勘误：

上期特约撰稿人灵子的邮箱应为：[liufang0815@gmail.com](mailto:liufang0815@gmail.com)，特此更正。

## 目录

###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

经济：苏小和  
写作：朱白 朱航满  
思想：成庆  
文史：王晓渔 贾葭

###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

孙骁骥：从纳粹少年到英格兰足总杯传奇

### 书评

---

杨克：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京都学派  
王晓渔：一次惊艳的宪政实践  
孙传钊：不屈的女杰

### 现场

---

成庆：突然降临的“马勒”！

### 随笔

---

夏佑至：救援队与志愿者  
刘柠：“萝莉控”的非常美与非常罪  
戴新伟：如此动人的细节

### 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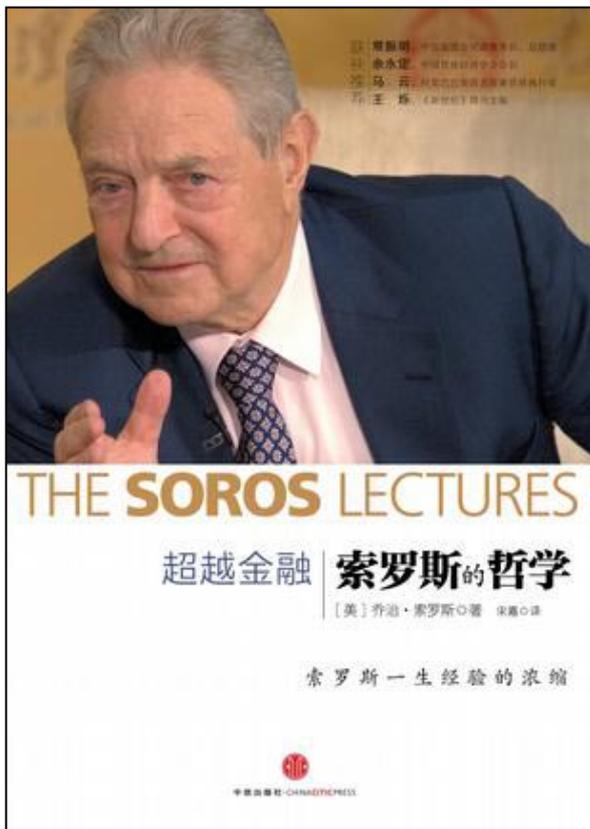
---

灵子：朱天心专访——纯文学的恐龙在这里  
灵子：唐诺专访——只有文学无法躲闪

##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这一段随手翻书还挺多，因为不是纯粹学术性的作品，所以读起来很快，渐渐地，意识到一个阅读主题，这就是开放社会下的经济建构和个人建构。比如索罗斯的《超越金融》(中信出版社，2010年2月)，又名“索罗斯的哲学”，似乎有点宏大叙事，但却名副其实。众人都看到索罗斯磅礴的财富，但他本人却最看重自己的理念。这位卡尔·波普尔的哲学门徒，长久以来迷恋开放社会的精神，同时他又又是从匈牙利逃到美国，这种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人生经历，导致索罗斯从经验的意义，看到一切伟大的企业家，事实上都是开放社会的产物。

而《摩根全传》(夏恩·彻诺，重庆出版社，2010年3月)，在一个当下的中国投资家看来，几乎就是一部金融野史。一个具体的感受是，如果摩根在中国，他显然无法起步，或者即使起步，他应该会很快锒铛入狱，而罪名则是破坏金融秩序罪。这么看起来，今天正在中国监狱里等待死刑的吴英，约等于当年美国的摩根。看来，吴英真是生错了地方。

没有自由，没有开放，怎会有今天星罗棋布的企业生态呢？怎会有我们丰富的生活呢？这是个常识。如果说索罗斯和摩根是一种拿来主义，那么诺斯经典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杨小凯纪念文集《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中信出版社，2009年)、简·柯里等的《全球化与大学的回应》(王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则是对自由与开放的理论探寻。其中诺斯的相关著作，过去曾经读过，

如果借着史料再读，竟然生出一种唏嘘之感。

开放社会成为我反复思考的路径，尤其是当我们把中国当下的经济格局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阅读的时候，开放社会成为我们必须守住的第一范式。比如近一段时间，中国最大的企业事件，当然是 google 离开中国大陆。关于这一点，各种说辞可以说纷至沓来。有人认为，这纯粹是一起企业战略事件，不值得上纲上线；有人则认为，这是正在开放的中国的一次不开放的行为；有人认为，这是一起企业之间的竞争，有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开放的企业和一个不太开放的国家之间的价值博弈。

索罗斯总是反复提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这让我兴趣盎然。我的意思是说，从索罗斯的哲学里，也许我能找到解读 google 事件的相对周全的方法。这些年，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全世界纵横捭阖，攻城掠地，他的方法论，应该是有某种启示意义的。

很有趣，索罗斯喜欢卡尔·波普尔。我所熟悉的波普尔，他的名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国内有一大批铁杆跟随者。这位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长期以来被西方学界誉为“开放社会之父”。从科学家到文史哲界的专家，从政界要员到企业家，无不深受波普尔学说的影响。尤其是他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甚至成为诸多商业天才的经营利器。而这一大批商业天才中，当然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索罗斯。

事实上，索罗斯是波普尔的嫡传学生。20世纪50年代后期，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他提前一年完成了毕业考试，为自己赢得了一年的自由时间。如此打发这一年的自由时光，索罗斯的选择是来到卡尔·波普尔的门下，让自己成为了波普尔的关门弟子。

从索罗斯后来的言说来看，波普尔对他构成真正影响的学术体系，仍然是著名的证伪方法。所以索罗斯上来就复述导师的观点，经验的真理不可能绝对确定，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毫无疑问地被证实，只能通过检验来证伪。即一个失败的检

验就足以证伪，而再多的确认性例证也不能完全证实。科学原理具有假设条件，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声称掌握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错误的宣称，所以只能强加于社会，所以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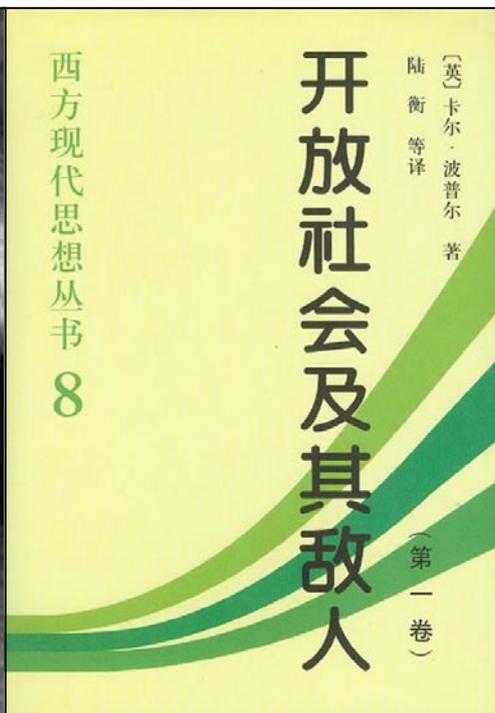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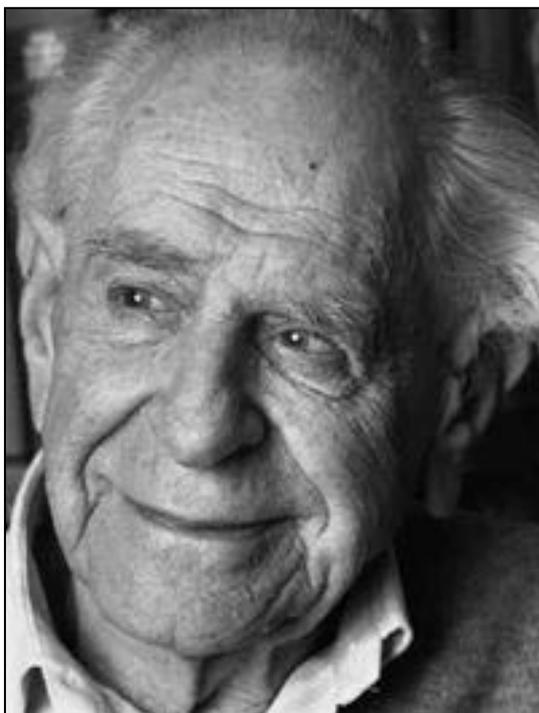
有人说，索罗斯显然不是波普尔最喜欢的学生，这种表述不虚，事实上索罗斯日后的发展显然没有沿着学术的方向演进，他不期然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有财富的金融大家之一。但索罗斯本人不这么看。他自己认为，正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对他构成了毕生的影响，他才得以成功，而且，他沿着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法论，这就是索罗斯反复解说的所谓反射性理论。

如何用最少的语句来陈述索罗斯的反射理论，并不容易，按照他不厌其烦的言说，似乎有点像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天体学上的宇宙和反宇宙，或者是社会学中的多样性、信息学里的无遮蔽多元信息场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索罗斯的反射性理论，必须建立在他的导师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架构上，否则，索罗斯一切的商业行为、一切的思想行为，均无从谈起。

这正是我喜欢索罗斯的理由之所在。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索罗斯简直就是一个怀疑一切的人，他总是试图寻找到更加多样性的信息，逐条加以怀疑，然后组合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所以索罗斯说，由于他在德国和苏联占领的匈牙利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知道一个不开放的社会如何抑制了他的才华，所以他才如此热爱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

不过，相对于观念的正确与否，索罗斯和他的导师一样，更加关注观念背后的方法论。即使在美国，索罗斯也一直坚守波普尔开放社会的理念，坚守他自己的反射性方法，他是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的真正门徒。比如关于汹涌的次贷金融危机，索罗斯就认为，这是信贷和杠杆使用的无止境增长导致的灾难，而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则是：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所以可以听之任之。由此，索罗斯批评了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认为他们忽略了绝对自由市场的另外一种反射性，即人的不确定性。而关于小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战争，索罗斯认为，正是对美国开放性社会的某种收缩，比如传播的主导原则和单一原则，才导致美国人最终同意小布什发动战争。在这样的意义上，索罗斯认为，这才是美国开放社会的最大危机。

任何一个人都很容易犯下矫枉过正的毛病，就像人的眼睛长在身体的前面，当我们朝前面看去，必然要丢失背后的风景，当我们朝左边看去，必然要丢失右边的风景。人总是一个有限的人。索罗斯显然是深深领悟到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去分析索罗斯这些年的金融大手笔，必然能发现，他总是试图超越金融，站在一个更加周全的地方打点自己的生意，他不是那种坐井观天的小生意人。有些



时候，他像批评家，有些时候，他又像杀手，有些时候，他锱铢必较，有些时候，他却是一名彻底形而上的思想者。

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企业家显然与索罗斯存在极大的差距。毫无疑问，中国当代企业家都是开放社会的产物，没有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企业家们一个也不会出现。但是，当这些企业家拥有了财富之后，我发现有相当一批人似乎成了开放社会的敌人。最明显的例证，是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普遍迷恋官商勾结，而官商勾结，毫无疑问是开放社会的死敌。而在新经济领域，很多年轻的企业家对越来越疯狂的信息封锁不仅不抵制，反而助纣为虐，幻想自己的竞争对手退出市场之后，自己可以分得利益，殊不知任何形式的信息遮蔽，都是对开放社会的遮蔽，而任何关于开放社会的抵制，最终必然导致企业

的式微。因为，人类企业发展史明显见证了一个事实，企业家必然是开放社会的产物。

一个成功的索罗斯，当然是开放社会的硕果。所以索罗斯在 50 岁那一年，在他的对冲基金增长到一亿美元之后，他开始思考，究竟什么事业才值得他继续发力？在漫长的思考之后，索罗斯终于决定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开放社会的基金会。他为这个基金会确定了醒目的宗旨，这就是促进封闭社会渐渐开放，弥补已经开放的社会种种不足，倡导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一名富可敌国的金融大鳄愿意站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批评的姿态，这无论如何值得善于拍马屁，善于官商勾结的中国企业家们学习。而关于今天的中国，索罗斯的建设性批评也让人耳目一新，他说现在的中国人还愿意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但不可能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需要公民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中国需要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绝对不可能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中国的繁荣。

关于索罗斯，还需要说一点什么？这名曾经因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激动不已的商人，事实上比很多中国人更能看到中国的危机，这名得益于美国开放社会的金融巨人，事实上一直在促进美国的进一步开放，他对美国社会任何一点点与开放为敌的行为都保持着巨大的愤怒。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家们是不是一直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呢？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当企业家们都不促进开放，甚至甘愿充当开放社会的敌人，那些耀眼的财富，那些光鲜的公司，又能存活多久呢？

图 2 为卡尔·波普尔

## ESSAY&FICTION 散文与小说

观察员 朱白（广州，[zhubai@tom.com](mailto:zhubai@tom.com)）



不久前王彬彬连续几篇质疑汪晖的文章，成为这个可怜的文坛的一股热闹，上窜下跳于空洞的阅读视野。人们趋之若鹜，就像围观章子怡捐款门事件一样，彰显了我们这个乏味时代的冷清热闹，空洞是其本质，无意义的喧嚣是其呈现的形状。我关心的不是王彬彬在那两篇质疑文章里指出的对方所有问题，而是这种质疑的方式在今天已经稀缺，大家习惯了慈眉善目的轻浮怜爱，运用久了你好我也好的所谓“东方智慧”，所以看到如此刻薄的质疑竟然也能让人耳目一新。

不管王彬彬的质疑有多少是属于吹毛求疵（我偏激地认为，之所以会让王老师如此来劲，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两个人在学理上的观点不同），有一点倒是说出了很多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病症，即“不好好说话”，或者我们可以同意王彬彬的，这种不好好说话，也许是因为当事人不会把话说好，只能以一种模糊的、暧昧的、唐突的表述方式来解释自己原本拧巴的个人主意。可以说汪晖为代表的不同类别的文艺工作者，在

一段时间以来以一种没逻辑的晦涩舞文弄墨，他们错误地以为晦涩本身就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表达的手段，他们以为晦涩原本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过程中一个手段。这种以晦涩为唯一内容的文艺作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诗歌就已经遗留出一副半身不遂的病症，到了 2000 年前后开始的新一拨电影导演，成了一股新鲜热辣的新世纪文艺躁动症患者。随便举两个一下子能想起来的例子，宁瀛的《无穷动》就是一部没谱的电影，导演以为“文艺片”可以为她解决很多问题，无论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拍一部什么电影，还是不关心自己到底要讲什么、要干什么，导演大概都是在想通过“文艺片”一言以蔽之来解决问题。最近的一部文艺片《翻山》更将这种拒绝与观众交流的派头演绎到激进的地步，完全丧失了一个创作者的基本责任感，还能自信地、口口声声地讲道理，我以为，作为一部电影，导演杨蕊已经在失控的状态下将之呈现出来一副彻头彻尾的失败模样，你再怎么狡辩也是为失败在辩护，这根本不是一个创作者应有的“善意”。

以我粗鄙的眼光来看，日本无论文学还是电影，都有一种善意的交流欲望，作者愿意以或平和或冲动的态度与人交流，这种交流欲望正是创作者应该与生俱来的，可以放在我们这里的诸多文艺作品上，已然成了某种稀缺的玩意儿。日本导演北野武的电影，不算一看就懂的那种，他不会平铺直叙地去讲述一些司空见惯的常识，而是大多用一种极致的方式表达自己独特的对世界的认知。即便他早期的《大佬》、《宁静的海，宁静的夏天》也不属于大众类作品。最近北野武的三部文字作品《浅草小子》（吴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向死而生》、《毒舌北野武》（李颖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被翻译出版，作为一个风云近十年的备受争议的亚洲导演，自然引人关注。北野武在《毒舌北野武》里尽是以交流为目的的言语，不一定卓越而独特，但看得出，都是出自真心的自由观点，没有矫情，没有不知所谓的一味为了表达而表达的梦魇之语。北野武在《没有通用〈富国论〉的国家》一篇的最后说：“日本这个国家是有钱，可是却不漂亮。……对我来说，比起裸体，还是迷你裙更让我感到兴奋！……男女一起睡过之后，找短裤或摘掉避孕套时是最害羞的。”

与之对比的中国小说家，最会写一种脑袋被门挤了的梦魇文字，不是我不懂，问题是世界上有一个脑子没进水的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这样的例子就不举了，因为到处都有。

日本文学一直是让我基本忽略的一个类别，这是虚妄的，即便没有最近读过的村上龙、太宰治都应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相比我们的文学，日本文学真是太高级了，不提经典的如川端康成，或者最近的好得已经不能再好的青年作家青山七慧等人，就算被打入畅销书“队伍”（在中国一直有歧视畅销书的偏见，以为畅销即是没有质量的代名词，这已经作为一种低级的“常识”存在很久了）的村上龙、太宰治也完全可以用写的太好了来形容。《寄物柜婴儿》（栾殿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2月）讲述两个被遗弃的孩子的故事，从他们被遗弃在寄物箱的瞬间开始，他们的一生命运就已经被定格在某个“悲剧”的轨迹上。弃婴阿桥长大后会展：“我一看到可怜的女人便想冲上去抱住叫声妈……”这种复杂的爱恨交织用三个动词“冲”“抱”“叫”就解决了。

村上龙更愿意在平静得近乎没有感情的语句中说出我们所说的“日常真理”，比如他讲弃婴阿桥、阿菊的养母身世时，不动声色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相貌不怎么样的女人，然后她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投奔亲戚后跟当地粗鄙的矿工来往，矿工们对这个稀有女性纷纷大现殷勤，包括不停地夸她美艳动人。但是，“离婚之后，和代初次上床的男人并不是矿工，而是保龄球技师，还是个有妇之夫。她是两个矿工一起去跳舞时在舞厅里结识了那个人。技师有私家车，开车带她乘渡轮去长崎和佐世兜风。技师的老婆抓住他们时，骂和代说就凭你这长相还敢勾引我家男人，和代听了很吃惊。”村上龙不容分说地把谜底或者说蒙骗人、给人带来美好念相的事实如此一针见血地掀开，并用简单但却不容置疑的口气让你一下子目睹真实状况后，还能既没有挖苦也没有同情地说道：“虽然技师的妻子比和代漂亮，但她很久没听人当面骂她丑，所以她无法相信。”这只是人的现实一种，回避还是廉价的同情，都毫无意义，此时的“坦言”有一种阅读的快乐。

说到村上龙，不能不提“双村上”的另一个村上春树。韩东曾经说“村上作为一个好作家是不可或缺的”，我没读过村上春树不是觉得他“层次低”，而是真的几次三番拿起来读不下去。后来有人告诉我，可能是翻译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位叫林少华的先生翻译存在问题，而市场基本村上的作品基本都是林少华“把持”的。这本《1Q84》（施小炜译，南海出版，2010年5月）或许是我走出谜团之作，很期待即将的阅读。其实这本书早就在我手机的阅读器里了，早早就下载了的，一直没有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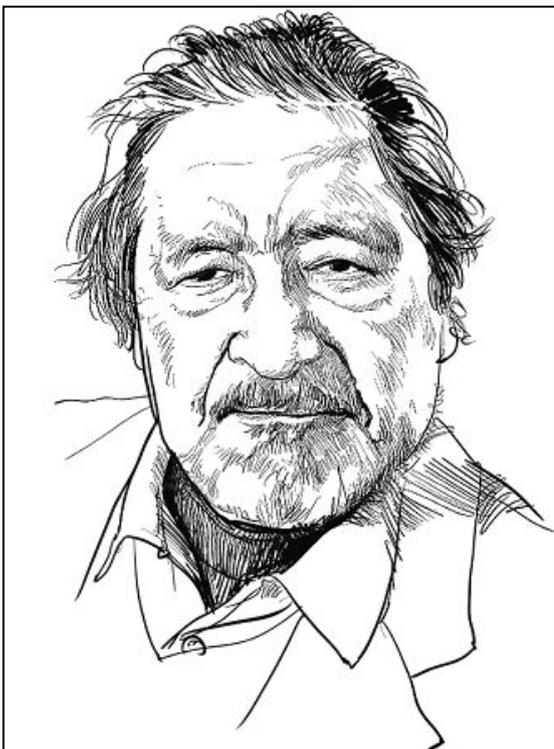


的去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跟这位村上缺了一点缘分呢。我想，下次再告诉读者结果。

奈保尔是我很期待的一位的作家，近年来他的每一部作品我都会关注，有时候很简单，就是想看看他是怎么刻薄的。《浮生》(奈保尔著，孟祥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是他晚年的作品，人一到晚年，多半会去写些跟自传有关的作品，这部《浮生》也如此。这个时候的奈保尔已经不再会被文学或者道德等桎梏，他怎么舒服怎么写，没人会觉得他的大白话缺少文学意味，或者对他的某些态度给与道德上的质疑，即便所说的这些存在，跟此时的奈保尔也关系不大了。相比《作家看人》(孙仲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来说，《浮生》已经算是收敛，它不至于让一个老朋友难过伤心了。

有人告诉我，在看泷田洋二郎的电影《入殓师》时掉下两种液体，一个是看他们吃河豚时的口水，一个是父亲死去时的泪水，这至少说明这部电影很懂得用情。原著小说《入殓师》(百濑忍著，吴彤影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4月)引进的时间有点晚了，过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时间段，但好东西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没了噱头的小说《入殓师》也值得一看，再说它的克制而巧妙煽情和精准的故事发展线索，都值得我们进入一下情感的体验中。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失业再就业时不气馁、有底气的精神，在我看来非常美好，这也是我能理解的人类尚存的美好情操之一。

曾几何时，凯鲁亚克就是今天的卡佛，非常流行，备受文艺青年追捧。只是今天的文艺青年已经退化成为一种时髦，一种接近庸俗和浅薄的潮流，比如那句“当我们XXXX时我们在XX什么”这种烂俗的句式，所用之人大概都不会看过原文。《巴黎之悟》(凯鲁亚克著，艾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时悄无声息，不再如当年粉丝雀跃。寂寞、解脱、寻求、宗教、顿悟，仅这些关键词今天看来也应该依然迷人，可是毫无疑问的是凯鲁亚克已经不能足以迷人了。是错过了时代，还是浮躁的人喜欢喜新厌旧？经典即腐朽和过时？当年受到凯鲁亚克教育过的一代人都哪去了呢？



最后推荐一本还是我想读而没有来得及读的书，《摇滚妈妈》

(角田光代著，伏怡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3月)，这是我想了解一下的角田光代的短篇小说集，包括川端康成文学奖获奖作品《摇滚妈妈》。以前写到青山七惠时，跟中国当代八十年代女作家作过比较，其结论不言而喻，而中国当代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几乎全军覆没，今天看来那一代不仅是无效的写作，也是充斥着大量虚荣、不实、矫情、避重就轻的写作，所以我们来看看同时期的日本女作家的状况，也可以让我们反过来认清自己。

图1为三支钢笔首尾相接，图5为V.S.奈保尔画像(李媛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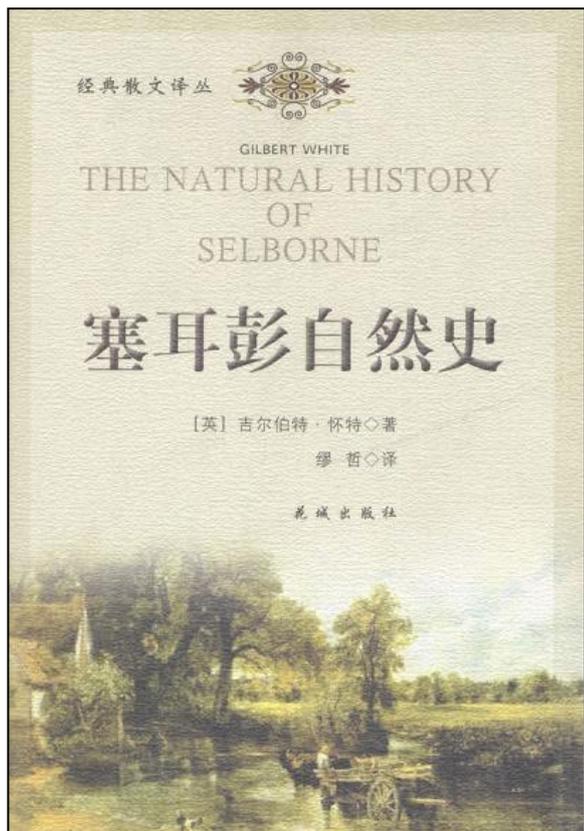
##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 [zhm7976@126.com](mailto:zhm7976@126.com))

缪哲先生好译笔，让我许久才找到他翻译的《塞耳彭自然史》(吉尔伯特·怀特著，缪哲译，花城出版社，2002年12月)，此书由英国人吉尔伯特·怀特所著，收入花城出版社的“经典散文译丛”之中。但若不是缪哲先生的译作，估计我是很难知道的，但奇怪的是，七十多年以前周作人已经写文章介绍了，而我读书前的序言，才知道怀特是十八世纪英国退隐山林的乡村牧师。这本《塞耳彭自然史》便是他在山村塞耳彭隐居期间所写的自然观察笔记，据说塞耳彭当时十分荒凉，少有人至，连通外界的只有一条曾被大水冲毁的小路。怀特在决心定居山村塞耳彭之前，曾为英国奥利尔学院的评议员，而选择乡村牧师，无疑还是一个清贫的职位，幸亏他的祖父遗留下一笔可观的财富，让他可以安心的在乡间衣食无忧的观察自然风物。怀特1720年生于塞耳彭，1793年去世，其间曾先后到温特斯特学院、牛津大学和奥利尔学院读书，1743年他获得文学学士，1744年3月又当选为大学的评议员。但在1755年他选择了以牧师的身份定居偏僻的塞耳彭，之后便不曾离去。据说曾有多次邀请他回到大学担任教职的机会，但都被他拒绝了。而究其原因，用此书的序言作者爱伦的话说，就是“他不愿分心教区

的事务，宁可在法灵顿作一名不起眼的副牧师，享受一个有学养的博物家的恬静生活。”

《塞耳彭自然史》以书信的形式写成，但其内容却专事倾谈山村里的自然风物，其对鸟兽与自然的观察极为细腻，读后令人十分的感动，但很长一段时间，这册《塞耳彭自然史》并无什么名气，文学史上也不曾留下什么位置；到了二十世纪之后，才逐渐具有了影响，给这册书写作序言的格兰特·艾伦这样评价怀特的意义：“说实话，能推进科学于万一的，天下并没有几人；假装推进科学，去蒙一点小小的浮名，这样的愿望，根子就在我们现行的学究教育中。但爱自然，观察自然，是人人都能的。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能从怀特身上取得教益。我们的目标，应是把自己塑造为立体的人；使自己有圆满、协和、博大的人性。我们都不愿作‘扁平人’。而怀特的方法与榜样，对预防流行于现代生活的‘扁平症’，则有莫大的价值。请以怀特的率真、无成见的眼神，去直接观察自然吧，问她问题，让她自己回答，不要拿仓促的答案强加于她；这时，不管你是否‘推进了科学’，你至少会使得人类中，多了一名真心爱美、爱真理的老实人，从而推进我们普遍的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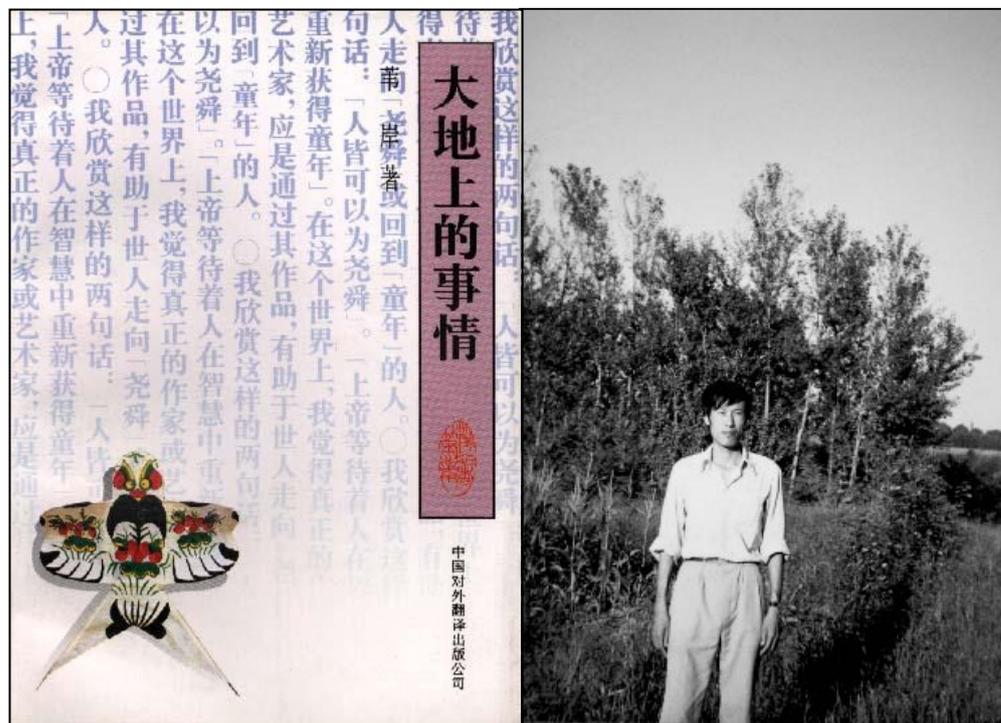
其实要说隐居者的自然笔记，美国人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更有大名，我手边的这册著作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绿色经典文库”之中。此书由著名作家徐迟先生译出，也是非常精准美妙的译笔，他在译者的序言中这样写到：“这本书是一本健康的书，对于春天，对于黎明，作了极其动人的描写。读着它，自然会体会到，一股向上的精神不断地将读者提升、提高。”真的要感谢徐迟先生，为我们奉献这样一册美好的译作。此书前附有徐迟在梭罗当年的小木屋前的照片，如今这里已经是供人们游览的保护区了。我从照片中看到木屋前的栅栏上有这样的文字：“WELCOME TO WALDEN POND STATE RESERAVATION OPEN 8 A.M. TO SUNSET”，翻译成中文就是“欢迎来到瓦尔登湖州保护区；开放时间：上午八时到日落。”我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散文作家王雪瑛曾两次到瓦尔登湖去游览，回来后写成了散文《回望瓦尔登湖》，文章发表在《钟山》杂志上，后来被收入到花城出版社的《2009 中国随笔年选》中，其中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在文章中，由梭罗的简朴生活而忧虑如今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真是怀抱热诚的赤子之心。

梭罗是哈佛大学的高才生，曾经当过多年的中学校长，受到美国思想家爱默生的巨大影响，两人一度过从甚密，他后来在瓦尔登湖畔伐木筑屋，就是在爱默生所属的林地之中。梭罗先后在瓦尔登湖边生活两年，在那里他独自伐木、开垦、种植、收获，过着丰盈而简朴的生活，正如王雪瑛所感慨的那样：“他一个人阅读，一个人写作，一个人思索，一个人生活。他以最低的物质水准，过着最朴素的生活；但他收获的是丰富的内心体验，一棵孤独的树上结出的思想果实。”1854年完成的《瓦尔登湖》见证了那段美好的生活，我从那沉静的文字之中感受到一颗宁静与欣悦的灵魂。起初，《瓦尔登湖》也缺少知音，甚至曾一度遭受讥讽，但很快便成为美国文学中一册独特而卓越的名作，徐迟先生在序言中这样写到：“严重的污染使人们又向往瓦尔登湖和山林的澄静的清新空气。梭罗从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这些生活之必须出发，以经济作为本书的开篇，他崇尚实践，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遗憾的是，在我们今天遭遇曾经西方相同的环境遭遇的时刻，却无法有一部可以与这册书相媲美的著作。

这种遗憾，其实是与一位中国作家的离去相关的。我曾经在一篇随笔文章中写到，作家苇岸可以被称作为是中国的梭罗，但因为他的早逝，使他没有能够写出一部中国的《瓦尔登湖》。苇岸本是写作诗歌的，但因为阅读了美国人梭罗的《瓦尔登湖》，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和影响，由此改写散文，并真正从生活本身改变了自己。苇岸生前居住在北京的郊区昌平，那时的昌平还是真正的郊外，从他的居民楼走出不远，便可以见到农田、植物和花鸟，这为他后来断续观察和写作长篇散文《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预备了现实的基础。这一组文章写到“谷雨”之时，苇岸就被发现患有癌症，因此这组文章最终成为令人遗憾的作品。由于深受梭罗、利奥波德等人的自然思想和伦理观念的影响，苇岸的作品风格不同于环境文学，而更接近在西方被称为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的文体。他在创作上，体现了对博物学的重视，表现出自然科学家一般的严谨。为了写作《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他居所附近的田野上选了一个固定的基点，每到一个节气都在这个位置，面

对同一画面拍一张照片，形成一段笔记，时间严格定在上午 9 点，风雨无阻。然而，他仅仅创作完其中的六个节气之后，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竟成为旷世绝响。我始终以为，《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也仅仅是他整个写作计划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遗憾的是，我们永远无法再见到他所设想的全貌了。

苇岸对于自己的文字十分苛刻，他所留下的东西极少，但每一个文字都显示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美好的见证与认识，生前他仅仅出版了一部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年 4 月）。能够读到这册散文集的人估计不会很多，我后来偶然买到他的散文集《太阳升起之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 年 5 月），系他离去后由友人整理完成的，这册书中收录了他临终前未曾完成的作品《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去年是他离世十周年的纪念，我一直想写点



东西表示自己的怀念与致敬，但却始终难以下笔，前不久到书店看到由冯秋子女士重新编选的苇岸散文集《最后的浪漫主义者》（花城出版社，2009 年 10 月），又增收了他生前的许多日记，我默读良久，为他的早逝又一次感到难过。这难过还因为我在书店里看到的另一册散文集中，某位享有盛誉的作家不无炫耀地书写自己在乡间的山南水北之间，构建豪宅，种植修路，偶作隐居，享受优待，从而写下那些所谓的山居笔记。更让我诧异的是，这种伪写作不但频频获奖，还在读者中畅销，真是悲从心间来。这也倒让我想起缪哲先生为《塞耳彭自然史》所写的译者跋记，末尾处有这样让人无不动容的感慨与遗憾：“对自然的兴趣，在中国如今已渐成小小的风尚，并有几位作者，是专写这一话题的，我与之有过数面之雅的已故的苇岸先生，是其中最出色的。1995 年他的《大地上的事情》出版后，曾赐我一册求我‘雅正’，我回信说，英国有一本自然史的名著，叫《塞耳彭自然史》，兄倘能读英语，可借来一观，或可稍去‘感慨多观察少’的毛病。我当时所谓的‘毛病’，是指我们的作者写虫鸟的话题时，每以虫鱼做感慨的引子，对虫鱼的观察，却失于肤浅，这是古人以香草美人托喻的遗风，不合现代自然史的传统。但人各有性，有以思虑见长者，有敏锐而知微者，不好用同一个标准第其优劣，故我当时说的毛病，也未见得是毛病。如今书已译成，欲呈一册乞苇岸先生的雅正，已无由寄达，说来不胜人琴之感。”

图 3 为苇岸

##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mailto:veron.cq@gmail.com)）

4月，与一干朋友游杭州，再度上三天竺参访。其中，中天竺在南宋禅院的“五代十刹”中跻身“十刹”之首刹，可谓名寺。“中天竺寺”在清代改名为“法镜寺”，如今规模相比上天竺的“法喜讲寺”而言，也稍逊一筹。无论如何，杭州寺庙之兴，今日仍然可以管中窥豹，无论是游人云织的灵隐寺，还是昔荣今衰的径山寺，以及以“南屏晚钟”闻名的净慈寺，杨万里的那首著名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是在净慈寺送别友人时所作。

以游记来讲寺庙文化，国内并不多见，毕竟今日佛教影响，局限于民间信仰，身处学院的知识分子与寺庙文化已经十分隔膜，就连许多研究佛法义理的学者，也未必能清楚了解寺庙的仪轨、艺术，如著名宗教研究学者杨曾文教授，就曾提到，

他经常在寺院里对各种佛菩萨造像感觉困惑，尤其对今日之寺院建筑、日常之活动，感觉陌生。连佛教研究学者都如此，况一般人士？最近读到王媛女士的《江南禅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倒是感觉十分清新，王媛女士是佛教建筑研究者，不过这本游记却写的灵动，除开大家今日熟悉的名寺，她还记述了许多我们只在史籍里了解的庙宇，如创立“百丈清规”怀海大师所立之百丈寺，虽然该寺历史上声名显赫，如今根据作者的描述，今天只有几间简朴的房屋，清静异常，她还看到僧人劳作归来在亭间下棋的情景，仍然继承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遗风。



古人以游记文字记录寺庙之意境与趣味，最近则有友人推荐一本专以摄影来表现佛教文化的集子——张望的《佛泽》（浙江摄影出版社，2008年1月），笔者孤陋，并不知晓张望先生在摄影界里的名声，不过这本以天台山佛学院与灵隐寺为主题的摄影集，却让我眼界大开。俗家众常对僧侣生活感到十分陌生，这常常会带来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过度神秘化，一种则是过度的俗鄙化，前者会认为僧侣威严神秘，代表某种神秘力量，后者却会以日常经验武断地认为，僧侣们要么只是逃避现世，要么只是汲汲营营，干些烧香拜佛、超生度亡的法事。张望先生以“世间人”的身份，进入寺庙旁观僧侣的修行与日常生活，虽然

其中一些照片难免有“摆拍”、“后期美化”之嫌，旁附的文字却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些照片拍摄的原委始末，佛门生活的“唯美化”意境也得以有所节制。不过佛法有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或许也不必太执着于相片本身意境是否“真实”与“自然”。作者最后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新加坡商人，因为看到他所拍的天台山佛学院的照片，居然最后有心发愿，将公司转赠他人，在2007年5月31日佛诞日正式剃度，成为天台山僧众一份子。如此妙事，倒是符合印顺导师常爱说的一句话“因缘真是不可思议。”

谈及印顺导师，去年8月，《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中华书局，2009年8月）已在大陆正式出版，可谓是佛学界一大盛事。尽管印顺导师的著作全集早已经由“印顺文化基金会”制作成光盘电子版，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是能在大陆能全部正式出版，可算是功德无量。今日经过理性化淘洗过的现代“知识人”，亲近佛教，往往感觉隔膜难入，尤其净土宗、密宗之类神秘色彩较浓重的宗门，更是避之不及。但是印顺导师作为论师，其著文理性有节，颇易让人接受，尤其是读到印顺导师所强调的经义：“诸佛世尊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时的那种振聋发聩感，至今难忘。

印顺导师身处人间，自然也曾有自惭时，读其自传《平凡的一生》，当年《佛法概论》被人密报“为共产党铺路”，印顺导师后来多次申请修正，虽得以过关，但是却让他大为懊悔：“我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平凡！我不能忠于佛法，不能忠于所学，缺乏大宗教家那种为法殉道的精神。我不但身体衰弱，心灵也不够坚强。这样的身心无力，在此时此地的环境中，我能有什么作为呢？空过一生，于佛教无补，辜负当年学友们对我的热诚！这是我最伤心的，引为出家以来最可耻的一著！”

抛却当年政治与宗教的是是非非，印顺导师在如此之逆境下，体认到护法之艰难，自身之有限，这与今日许多知识分子借名利、借知识以自隆、自我神秘化相比，不可以道里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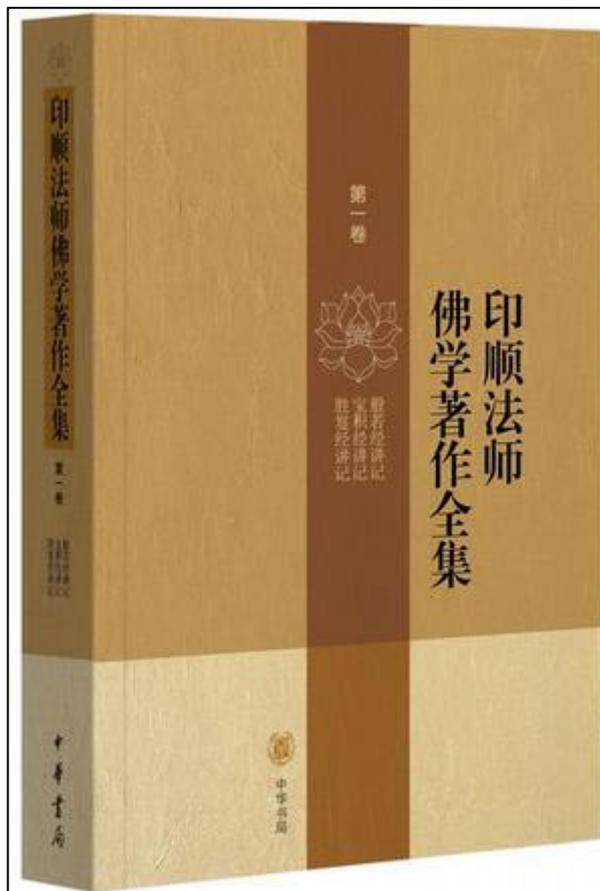
谈佛教，或许也不得不谈政治。欧阳修的《归田录》里记载，宋太祖开国之后视察大相国寺，问高僧是否应在佛像前跪拜，高僧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姑且不论这等轶事是否为真，有宋一朝，佛教发展十分兴旺，根据刘长东的研究——《宋代佛教政策论稿》（巴蜀书社，2005年7月），宋太祖之所以尊佛，其实缘于其以兵变立国，合法性缺失而来，如当时流传麻衣僧的“太祖受禅之讖”，将宋太祖看作是“定光佛转世”，其合法性顿时经由佛陀转世得以确立，也使得宋代政教关系一直保持稳定，不至于出现“唐周法难”的悲剧。

研究历史，是为观察当下，今日内地政教关系，属于敏感问题，不可详论。但是最近在青海玉树发生的震灾，却让我们看到藏传佛教寺庙在社会救济方面的积极作用，更让我关注的则是藏地佛教徒对于“生死观”的信仰。“往生净土”、“六道轮回”这些观念对于内地世俗化比较彻底的人们而言，无疑显得十分“前现代”，甚至会轻易地打入“封建迷信”之中，但是生死问题对于国人而言，当真已经解决，毫无疑问？是将自身看作是天地之偶寄，大海一沓，还是信奉“挥霍一生，一死了之”的世俗生死观？无宗教的生活，对于国人而言，是否真是可能的？

我对此并无答案，只不过需要稍微提及的是，就早在晚清与民国时期，“净土信仰”之类被知识分子所鄙弃的法门，就曾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无论魏源还是杨文会，都是净土信仰的尊崇者，而印光大师当年更是在民初的上海、江苏、浙江一带风靡一时，成为净土信仰大弘法者。而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净土信仰从未在民间断绝，这不禁让我们生起一个疑问，儒家正统学说所言，国人以“孝道”与“祖宗崇拜”作为主要信仰，是否也是一个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假设？刘长东曾有著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5月），里面概述了隋唐时期弥陀信仰的鼎盛之势，而直到近代，也只是在嘉道年间才因国力凋零而中衰，如果翻阅任何一本介绍中国民间宗教史的著作，都可以看到弥勒、弥陀净土信仰在民间社会的广泛流传程度，这种影响力每到乱世来临，便会以各种民间教派的形式崛起，只不过传统儒家往往视其为异端，并不正视而已。

宗教教育在国内，如今仍是失之阙如，姑且不论如今学生压力之大，无暇阅读其他书籍，宗教教育本身在教育体系之中，也仍然是敏感地带，难以结合。最近读到梅原猛的《佛教十二讲》（雷慧英、卞立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才发现日本宗教教育同样面临困境，此书是梅原猛面对一帮初中生的系列讲座，内容自然无甚高论，但是却提醒我们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民国时期蔡元培曾试图以美育代宗教，仍然是想为人类心灵留一块地盘，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但今日非但美育式微，真正能切中肯綮的宗教教育更是难觅踪影，回避宗教，真能回避掉中国人的心灵危机吗？还望众人与我一同深思。

图1为张望摄影作品《神游》



##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mailto:wxy1978@hotmail.com)）

四月乍暖还寒，赵越胜先生的《燃灯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让人最难将息。全书只有三篇文章《辅成先生》、《忆宾雁》、《骊歌清酒忆旧时》，三位主人公，周辅成先生虽是学界宿耆却名声不彰，刘宾雁先生略为读者所知，唐克先生是赵越胜的旧友，无人识得。读完《燃灯者》，竟然有些恍惚，仿佛自己就是作者，与三位主人公是莫逆之交。



尤其占到全书一半篇幅的《辅成先生》，使得两位人物同时在我面前生动起来。没有这篇文章，周辅成仅仅是一个名字，有了这篇文章，音容宛在。作者赵越胜，此前我仅在“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名单中似曾相识，读过这篇文章发现又是一位“世外高人”。80年代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集结了当时北京青年学者的中坚力量，其中许多成员此后在学界攻城拔寨，成为领军人物，也有一些渐渐消失，赵越胜属于后者。《辅成先生》记载了辅成先生的感慨，在一个思想定于一尊的时代，“礼失求诸野”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就算林下泉间有遗贤，要么默默终老，要么抓去杀头。赵越胜乘桴浮于海，不会有因言获罪之虞，但是在一个地球村时代，他的文字依然被隔绝于海关之外。

辅成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好友许思园先生：“他在特有的孤特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赵越胜以为“这段话再恰当不过地描述了先生的一生所求”，我想这段话也适合所有林下泉间的“无名之辈”。辅成先生虽居学术重镇，却处江湖之远，2001年5月35日，他手书条幅“殷鉴不远，多行不义必自毙”，挂在自家墙上。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北大校方无一人出席告别仪式”。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种“殊荣”。像季羨林先生、钱学

森先生赢得生前身后名，反而让人有“不以为荣”的感慨。

《辅成先生》的文革部分曾以《小青工与“学术权威”——文革后期问学于周辅成先生》为题，刊于《记忆》第36期。恕我直言，我不太喜欢这个有点“知音体”风格的标题，因此差点错过这篇文章。通观《辅成先生》全文，两者的交往将小青工和“学术权威”这种身份差异弱化到几乎为零。不过，这里依然要隆重推荐《记忆》，这是与“独立阅读”相似连续读物，诸位有兴趣可以网上搜索。

四月份阅读新书有限，我一头扎进故纸堆里。20世纪30年代世界书局编印的《诸子集成》，198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此后不断重印。我手中是1996年第8次印刷的版本，8册定价195元，80元拿下，一直束之高阁，平时主要使用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这一两年，我对法家特别有兴趣，之所以有兴趣，不是因为认同法家，而是因为无法认同。上海书店出版社的《诸子集成》第5卷收入戴望的《管子校正》、严可均校的《商君书》、钱熙祚校的《慎子》、王先谦集解的《韩非子集解》，将几本重要的法家典籍一网打尽。同时，还收入梁启超的《管子评传》、麦孟华的《商君评传》、陈千钧的《韩非新传》、《韩非子书考》，不知为何，这几种在中华书局影印时被删除。

新文化运动常被归纳为“反传统”，文化大革命也被归纳为“反传统”。“非儒”确有此事，“反传统”言之过简。从外儒内法到批儒崇法，法家岿然不动，这个传统在被称为“反传统”的20世纪里“一百年不动摇”。儒法在何种情况下互为表里，在何种情况下又水火不容？需要一一分析。主张打倒孔家店就可以建立现代民主制度，未免忘掉了批儒崇法的辉煌，打倒孔家店和砸烂公检法并存的景象，距今并不遥远；主张重建孔家店有助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需要解释为何两千年帝国时代儒法可以相安无事，最多只是有循吏和酷吏之分。



这个月，还将一套“中国近代期刊影印丛刊”（岳麓书社，1999年）请入家中，共有四种：《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观察》，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标志性同人刊物。这些民国期刊都已经有了电子版，但电

子版主要是供检索之用，我不太习惯一页一页地阅读。为了浸淫于当时的思想氛围之中，尽管家中书满为患，还是决心将这些杂志放在案头。影印质量并不理想，很多地方辨认起来非常吃力，可是坐在家中，慢慢翻着这些杂志，不是为了申请或者完成某一个课题，而是为了解答心中的问题，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但是，这种美好的感觉持续不了太久。作为一个时评写作者，看到很多时评过了很多年依然有效，不知是为时评的经久而击掌，还是为很多问题总是踏入同一条河流而失语。有时想想，不如建立一个全备的评论资料库，按照主题归类：遇到以言获罪，调出1919年6月《每周评论》刊登的《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出现钓鱼，调出1951年6月《自由中国》刊登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举办展览会，调出1910年1月《申报》刊登的《劝业会与立宪》——这样，时评写作者就会轻松许多，再也不用疲于奔命地赶稿，以至于没有时间读书了。

图2为周辅成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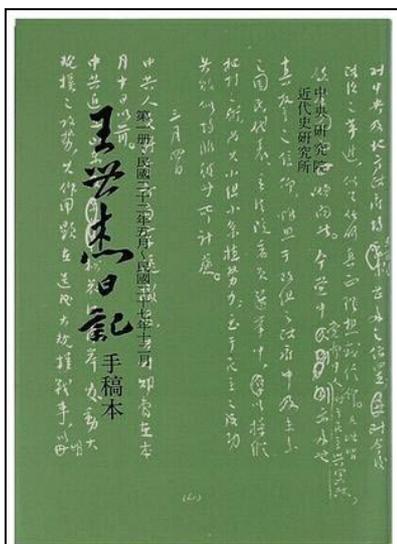
## HISTORY&CULTURE 文史

特约撰稿人 贾葭 (北京, [jiajia80@gmail.com](mailto:jiajia80@gmail.com))

我以前做新闻编辑之时，曾有一种感觉，好的新闻特稿，读起来像是在看一部纪录片，有可视化的效果。后来发现，有时候读书也会有类似感觉。手上这本《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是先前买的旧书，最近才读，谁料竟不能罢，两天读毕，像是看完一部电影纪录片。这本书以1944年至1946年之间的国共政争为主要事件，解释了抗战后的和平建国如何以及为何被扼杀。

作者并未遵照现代史的常规历史时限来描述，而是截取了1944年到1946年这三年的过渡阶段，条分缕析地讲述了国共历次谈判过程。阅读的体验是很奇妙的，你明明知道结果，却还要每次在千钧一发之时忍不住假设：倘若当时如此如此，现在便如何如何。这种体验又有些像侦探片，宪政建国理想被扼杀了，你知道这个凶手是谁，但又非常想知道它的作案过程是什么。

好几次，令人不禁扼腕捶床，这个过程实在过于跌宕起伏和出人意料。国共谈拢一次，看官便以为和平有望宪政在即，随即却因为细节而破裂，再接着续谈。如是者五六次，每次都把心吊到嗓子眼儿。看过《建国大业》的观众也许都该看看这本书，旧政协和新政协的差距太大了。曾经一度，国共的谈判已经完全达成一致，甚至都商谈好周恩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但终究功亏一篑。



以前和几个朋友曾经做过一个游戏：假如时间之钟可以倒拨回去，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拨到哪一年？少数人选择1840年，大部分人都选择1916年，袁世凯称帝结束之时。在印象中，中国现代史上，中国每次在攸关国运的十字路口，总选择了最差的那一条路。其实不然，倘若这本书中的五六次谈判，双方能够遵守一次，那么，中国当代史便绝非如此。

当然最后之破局源于双方战后在东北之争夺，而东北问题又与苏联密切相关。从外交角度，中苏条约规定了苏联不得支持共产党，但从意识形态上，苏联又无法不支持共产党。我们知道，有宋以后，中原王朝之灭亡，往往系由北方割据政权挥鞭南下，据东北者得天下。(见丁力《地缘大战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何况战后的东北，是中国重工业最为发达之地。毛在和谈中曾指示东北局，友军撤退后占据长春，以之为首都。

作者邓野先生是如此解释破局疑问的，武力割据就是民国政治的逻辑，国共两党都深谙此道。日军尚未投降之时的1944年11月，延安便命令王震南下，在湘鄂豫

屯兵，阻止未来国军之接收，东北亦复如是（见《陈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10月）。东北接收乃至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因为这很可能导致着美苏两个大国的直接对峙（见《李洁明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2003年）。

武力产生的问题，只能诉诸武力解决，因此内战不可避免。和谈本来就是要解决武力问题，然则和谈又是以武力为后盾，去解决超武力的民主与和平问题，当然无法谈拢。关于民国的武力逻辑，陈志让先生曾在《军绅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提出过。陈先生认为甲午战后，中国即陷入分崩离析之态，以地养兵，以兵扩权，影响至1949年。即便是中原大战后的蒋，亦不过一新军阀耳。

不过蒋在形式统一全国之后，曾试图建立新型社会组织，待训政完成后进入宪政阶段。惜乎倭人挑衅，不得不在国民大会后继续实施训政。而训政，恰恰又是后来共产党反对的口实。每一次政治及社会转型，都会被一些必然因素打断，像是宿命一般。

而第三方面完全不懂得这个道理，提出军队国家化之问题就显得多少有些幼稚。在这个逻辑之下，没有军队就没有党，也没有权力，没有军队的党只能沦为花瓶，但是第三方面恰恰是不甘心做花瓶，才以民主为口号积极参与权力分配，在国共看来，无异痴人说梦了。所以后来花瓶的命运也是不可避免的。国共两党当时表面上都表示接受美国之两党制，只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被否认，完全不打算给第三方面空间。

作者写作此书时，最常用的引证资料是《王世杰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其次是《唐纵日记》和《周恩来年谱》。王是数次谈判的亲历人，又是《中苏条约》的缔约人，对美苏和国共的情况都知之甚详。大约写作时，胡佛研究院尚未开放蒋介石日记，否则将会有更多实证资料。不过，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一书的后半部分，就详细描述了蒋当时的状态。

这本书框架的新奇之处，雷颐先生几年前已有书评介绍，兹不赘述。对于抗战后到中共建政前的那一段历史，实在值得注意。盖因我们现在政治领域的话题，几乎没有超出当年的命题范围。甚至，彼时要走得更远。至于作者说的两党不可能超脱于民国政治逻辑，只是事后之归纳。倘若去掉期间的细节因素，仍堪期待。

战后中国白驹过隙般的民主转型机遇，竟因东北一地而毁于外敌之手。我不记得是哪本书哪个人说过的话：近三百年，毁我中华最烈者，以罗刹为甚。诚哉斯言。

##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 ENGLAND 英格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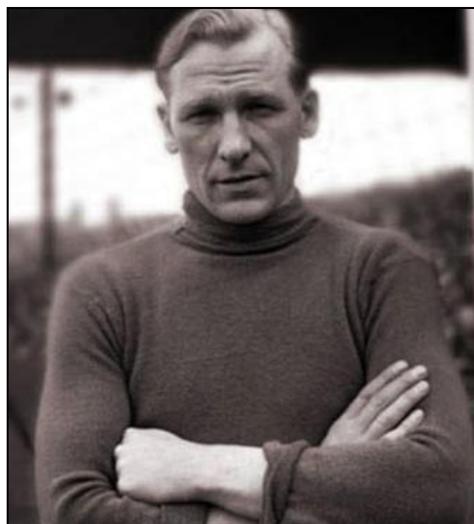
#### 从纳粹少年到英格兰足总杯传奇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北京，[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mailto: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在中国做一个球迷既幸运又不幸。不幸的是中国男足的集体缺钙和集体腐败几乎已经让去球场看球成了万人同时骂娘的行为艺术，幸运的是我们还能通过 CCAV 足球频道了解到世界各地联赛战况，认识众多中国以外的足球明星，为巴萨、国米、曼联等值得为之喝彩的球队喝彩，不用鸟在这国度眼瞅着一群肾虚的欧吉桑踢山寨足球——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绝对是导人向善且毫不人道的行为。

这句话的意图，不是准备批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中国足球，而是为了引出下文，一本谈论英国足球的书，准确点说，它其实是一位足球守门员的传记。传记的主人公叫特劳德曼（Bert Trautmann），曼城队历史上著名的传奇门将。

特劳德曼能被世界球迷记住的“经典之作”，便是 1956 年在曼城对伯明翰的足总杯决赛上，帮助所效力的曼城队夺冠。在那场决赛中，他在颈部骨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比赛，并多次封出伯明翰城的射门，最后以 3 比 1 击败



伯明翰捧得历史上第三座足总杯。直到比赛结束才被送到医院急救。这种近乎不理智的“献身”精神，为他赢得了英国足坛广泛的尊重。英国天空体育台在 2005 年评出的足坛历史上十大门神中，特劳德曼赫然在列。

但这位英国门神，却是个地道的德国人，二战期间还与纳粹有过一段关系。

特劳德曼 1923 年 10 月出生在德国不莱梅，家庭原本属于有车有房的中产，但 30 年代濒临崩溃的德国经济逼迫他的家庭卖掉了产业，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接受过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在 1933 年希特勒正式成为德国总理之时，特劳德曼也加入了德国少年团（Deutsches Jungvolk），成为了纳粹的“预备役”。

尽管从小喜欢足球，并且一有时间就会练习，但是战争让特劳德曼真正接受专业足球训练和踢足球比赛的时间有限，在战争期间，特劳德曼曾参加空军的作战部队，传记作家 Catrine Clay 在《特劳德曼的旅程：从希特勒少年团到足总杯传奇》中记载，特劳德曼目睹过德军对犹太人的屠杀，并且他自己也在前线和盟军作战，在战斗中杀死过不少盟军战士。

特劳德曼这一项不那么“光彩”的历史，却让日后成为曼城守门员的他受到了不少球迷的非议。在 1945 年战争结束时，特劳德曼和众多德军一起被捕，辗转关押在英国的数个战俘营。这期间，他也开始真正涉足于足球，他在那一时期为利物浦的一间小球会踢球，但他的业余队友们却惊奇地发现，这位名叫特劳德曼的守门员技术确实了得。终于，在 1949 年 10 月，他得到了曼彻斯特城队的青睐，很快成为了一名职业足球员。

但曼城的球迷无法接受特劳德曼曾是一位纳粹的事实，来自全英国球迷的指责信业纷纷来到了曼城。有一次前往伦敦和福尔汉姆的比赛中，体育场的不少球迷都冲着她喊：“纳粹”、“德国佬”（Kraut）并要求他立刻滚回去。然而，他只是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专注于赛事。当那个赛季结束以后，特劳德曼极少的失球数让他获得了大多数球迷的尊重，球队也对他倾注了尽量多的信任，在后来他职业生涯中两百五十多场比赛中，特劳德曼只缺席了其中的五场。特别是在 1956 年那场足总杯的决赛，其英勇无比的表现也是让人十分之刻骨铭心。

但这本传记并不是仅仅关于足球的，更是关于历史自身的。《观察者报》对本书的评价是：这本书的真正意思并不是要讲述各个时期的特劳德曼，而是要透过他来反映纳粹德国的某些侧面，以及战后一部分德国人心态的转变。足球“牵”出来的，是沉重的历史。

Catrine Clay 在书里问特劳德曼在当年在纳粹德国是否思考过屠杀犹太人这一类问题正义与否。他回答说，在纳粹德国的时候，人们尽量避免去面对、谈论这些问题，而是将其当做一个不需要动脑的“政策”去执行。但在战后回想起来，他对自己和自己国家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难当，时刻希望赎罪。当他的第一任妻子在一次家庭聚会的饭桌上，和他开起了“嗨希特勒”的玩笑时，他因此勃然大怒，后来居然和她离婚了。如今已到老年的特劳德曼，逐渐远离了足球，现在更多关心的是为德国和英国的友好关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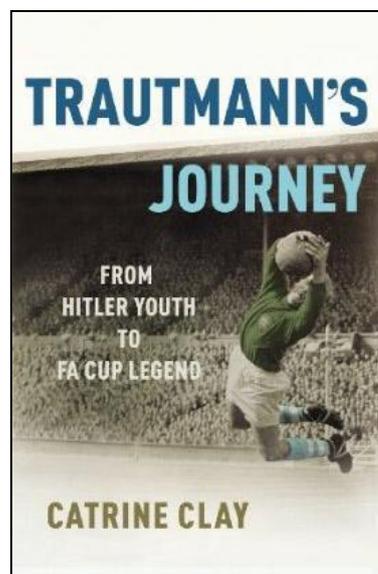
到今天为止，有一个镜头仍然盘桓在特劳德曼的脑海中无法散去。那是在他被派往俄罗斯前线的时候，有一天深夜他被枪声吵醒，于是顺着枪声在森林里寻找来源，后来他在一片空地发现了灯光，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自己的军队同僚正在成批地枪杀苏俄战俘，包括男人、女人、小孩在内的俘虏一律被处决，尸体就地掩埋在战壕里。

这是特劳德曼的梦魇，所幸有足球充当他的疗伤剂。一个从希特勒的德国少年团走出来的孩子，日后却成了英格兰足总杯比赛上的英雄，这固然是战后英德互相谅解后民间关系转暖的标志，但换个角度考虑，这何尝没有展现足球的巨大魅力。这门人类共同的语言最大的作用是不同的人用来消弭隔阂，化解误会的工具，而不是加速仇恨和暴力的催化剂。这是关于体育和足球的一个起码常识……

记得有人说过一句话：“中国足球在技术上落后五十年，人性上落后五千年。”调子定的有点悲观，但我们也该看到，如果想缩小这五千年的人性差距，光靠疯狂训练一帮小孩颠球是帮不上忙的，这最多只能为中国杂技代表团输送一批人才。人性上那缺失的五千年，不仅代表了一种文化，还代表着一份思索、一份感动，以及足球和真实世界乃至历史本身活生生的联系，这种联系需要人物让我们铭记，需要故事为我们传送。更需要书籍——它能让这项运动变得立体起来。

**Trautmann's Journey: From Hitler Youth to FA Cup Legend, By Catrine Clay, Publisher: Yellow Jersey Press, April 2010**

图 1 为特劳德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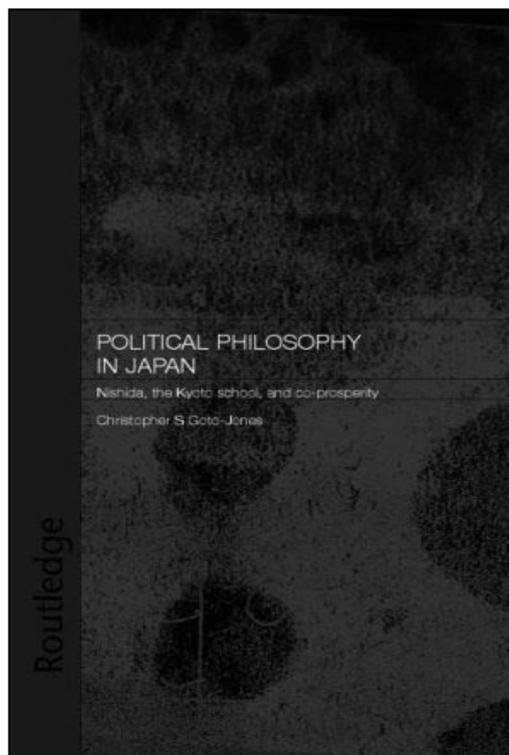
**BOOKREVIEW 书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京都学派**特约撰稿人 扬克 (德国·图宾根, [asukashinjirei@gmail.com](mailto:asukashinjirei@gmail.com))

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兄弟连》姊妹篇《太平洋战争》最近热播。无巧不成书，近日去一德国友人家中做客，物理学出身，却对哲学、神学颇有钻研的男主人在餐桌上大谈日本京都学派哲学，将西田几多郎的场所逻辑、西谷启治的共时性概念信手拈来、娓娓而谈。早知京都学派是日本近代哲学大宗（日本东洋史研究领域也有以“京都学派”闻名者，此处所说京都学派专指西田几多郎、田边元、西谷启治开创的哲学学派），早在上世纪初，他们对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德国哲学家的研究水平就不输今日中国哲学界，他们更大的成就则是融贯东洋与西洋的哲学思考，在战后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对话。但京都学派具体有何思想却一直无暇深究，如今有此机缘，就想去校图书馆找几本书来一阅。谁知翻译成德文的京都学派著作和德国学者所做综述性介绍大多被借出，却发现两本讨论京都学派政治哲学的英文著作，一是英国学者 Christopher S Goto-Jones 的《日本的政治哲学：西田几多郎、京都学派与共荣》，一是美国专栏作家 David Williams 的《捍卫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京都学派哲学家与后白种权力》。翻罢这两本单是标题就有些挑动中国人神经的著作，倒发现一段向所未闻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思想史插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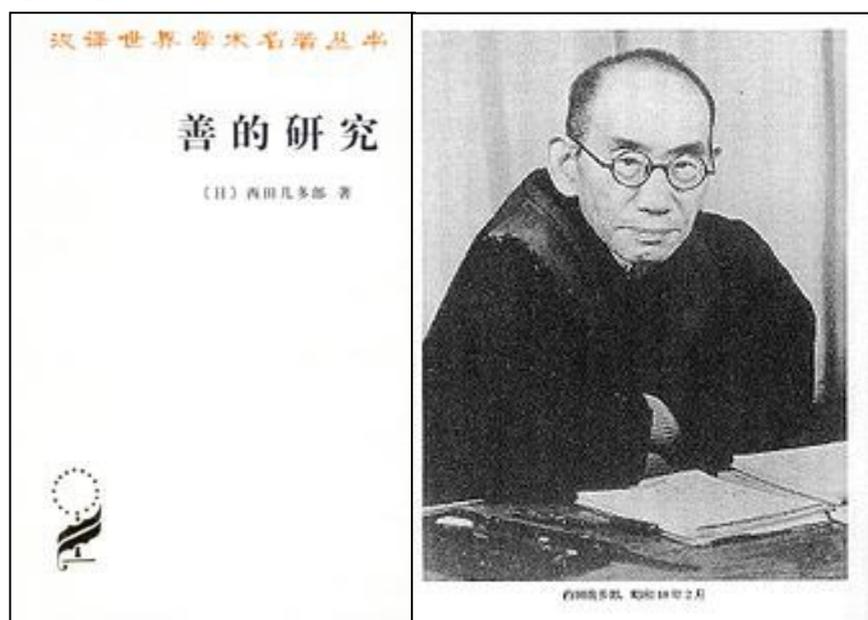
这段日本战时思想史可从日军空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周前讲起。1941年11月26日，高坂正显、高山岩男、铃木成高和西谷启治四位京都学派成员和所谓日本浪漫派的艺术师及若干其他学者参加了可谓当时日本《读书》杂志的《中央公论》举办的圆桌座谈，会议名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这个名称蕴含着京都学派吸收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历史主义学派思想发展出的一套世界史的哲学，且不论这套历史哲学体系，单是将世界史与日本对立就已彰显出大日本帝国崛起时期日本思想家们自信满满的心态，不禁让人联想到现今国朝到处打着中国立场、和平崛起旗号的研讨会。《中央公论》社座谈会上高谈阔论的与会者除了京都学派的哲学家，还有诗人、音乐家、电影工作者、文艺批评家以及历史学家，倒也与大呼“中国不高兴”的思想中年、文艺中年们的职业成分相类。哲学与艺术显然更适合在面对历史洪流时刻提供统观全局、激扬斗志的意识形态强心针，它们往往不由分说地将所有人都纳入以国家、民族为名义进行的集体行动，并相信真的存在他们那套宏大叙事中以国家、民族为主词的历史进程。

这些身具浪漫气质的人文学者与国家权力的主动合谋，跟关心务实的国家治理、社会组织的法学、经济学学者在日本军国主义崛起过程中的遭遇恰成对比。早在1932年五一五事变后，日本军部势力不断做大，文官政府式微，法律和经济专家就开始丧失在政界的影响力。1932年10月日本宪政学家美浓部达吉的著作和主张被当局禁止。美浓部达吉是1912-1926年的大正民主时代声誉卓著的宪政学家，他所主张的“天皇机关论”对以立宪政友会为首的政党政治家们颇有影响，他在1912年发表的著作《宪法讲话》几乎被所有日本大学采纳为标准的法学教材。但时至昭和年代，脆弱的大正政党民主制逐渐瓦解，美浓部达吉也最终因为“天皇机关论”受到主张“天皇主权论”的右翼教授以“不敬罪名”为名义进行的攻击，被当局压制。三年多后的二二六事变，残存的文官政府再次遭到右翼军人清洗，这次死在暗杀者手中的包括财政部长、银行家和经济专家高桥是清。

哲学与艺术自然并非本质上热衷于为国家崛起、民族扩张提供理论背书，它首先取决于从事哲学与艺术工作的人。就在美浓部达吉事件后，京都学派宗师西田几多郎在日记中写道：“我对美浓部达吉感到难过——未来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将无法研究公法，特别是，我们将无法研究真正的民族历史。”尽管一直被同事和学生们批评缺乏对现实政治的关怀，西田几多郎对时局的感受无疑是准确的。这一感受与他早年的政治倾向有关，《日本的政治哲学》一书的作者 Goto-Jones 提到西田在中



学时即对当时的立宪运动抱有热情，阅读了民主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著作，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时与一干同学拍照留念。可惜后来作为维新元老的萨摩长州藩阀同盟阻碍了日本走上健全的宪政国家道路。1890年开始在所有学校重要活动上宣读的《天皇教育敕令》(教育ニ関スル勅語)将对天皇、国家的忠诚等保守的儒家价值观设立为学生伦理准则，西田对此非常反感，与同学一起退学以示抗议。此后入读京都帝国大学，西田越来越远离政治，潜心修炼禅宗、钻研西学，对费希特、黑格尔乃至当时德国影响最大的现象学均有了相当了解。1911年他出版《善的研究》，开始构建以后来提出的“绝对无”概念为核心的哲学体系，1913年担任京都大学宗教学讲座教授，转而升任哲学史第一讲席教席，与同事田边元、学生西谷启治一同创建了京都学派。然而时局的变化使西田无法继续置身政治之外，当军国主义建立起专制政权时，作为日本哲学界泰斗，他已不可能摆脱现实政治的干扰。



美浓部达吉事件后不久，教育部设立教育与学术复兴委员会，西田与同事田边元、和辻哲郎被要求参加。他和这个委员会的教育改革思想完全对立，对此只能消极应付。1936年二二六事变让西田明确意识到军国主义将把日本引向灾难，但次年他在贵族学习院任教时的几位学生近卫文麿、木户幸一和木村毅擢升为政要后，不得不在后者的邀请下进一步卷入政治漩涡。这一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西田和他的这几位学生尚且还对军方主导的扩张政策持批评态度，西田发表演讲，呼吁尊重世界上诸民族的多样性，在给木村毅的信中他写道：“我想我们必须思考处于世界中的

日本，不仅仅是日本的日本，否则像‘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东西将毫无意义……”1940年时任首相的近卫文麿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可以看到西田思想的影响。木村毅甚至安排老师与海军将领高木惣吉会见，希望他能影响军方开明派。但西田对于介入政治仍保持谨慎的态度，他小心地与当局的极端民族主义说辞保持距离，发表数篇文章试图批判地评论日本帝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重要文献《国体本义》。这些努力却又不免任何效果，尽管他拥有给天皇做新年演讲的殊荣。

相反，他的京都学派同仁们纷纷投身政界。和辻哲郎积极参加教育与学术复兴委员会的活动，参与撰写了臭名昭著的《国体本义》。三木清成为近卫文麿新秩序运动的智囊。尤其是京都学派的另一位奠基者田边元在教育与学术复兴委员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还鼓励学生献身帝国战争，发表了一系列军国主义的宣传文章，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政策提供了一套黑格尔式的哲学说辞。1940年西田私下对一位学生说：“田边这家伙完全是个法西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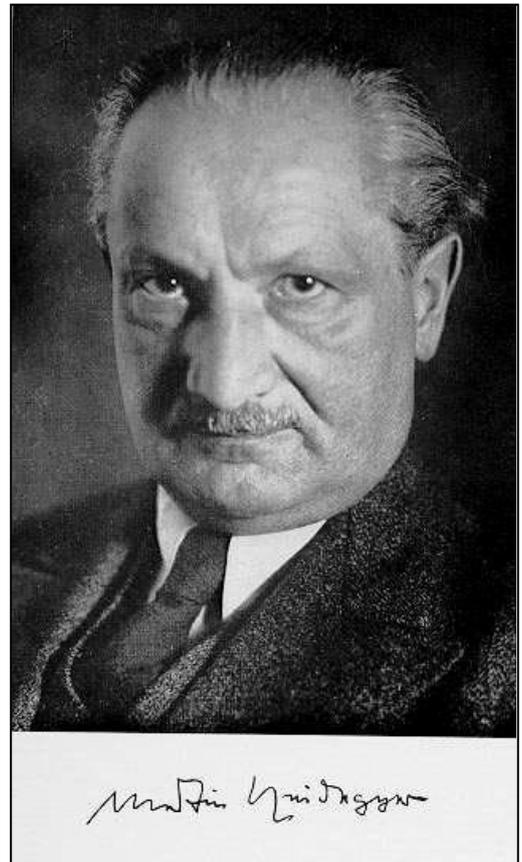
田边元1920年代初在西田支持下留学德国，师从当时的哲学新星海德格尔，在日本发表了最早介绍海德格尔思想的文章。1924年归国船上田边研读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他后来发展出的一套历史目的论打下伏笔。他的思想日趋成熟后，在发展西田几多郎绝对无概念的同时也开始批评自己的这位师友。与许多同道一样，田边认为西田看重的纯粹经验仅仅是一种稍纵即逝的静止状态，缺乏辩证的发展，他过于忽视真实世界，忽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由此田边发展出种族的逻辑理论作为对西田场所逻辑的超越。1942年9月29日田边元在京都海军学校的秘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共荣圈的逻辑》的演讲，《捍卫日本的太平洋战争》的作者David Williams特别将这篇演讲译成英文。田边在演讲中用非常纯粹的哲学语言论述了从家庭、国家到种族共荣圈的辩证发展，家庭、国家在他看来都不是静态的稳定结构，它们虽然具有纵向的权力等级秩序，但在横向上却面临变动，家庭必然经过通婚接受其他家庭的女性成员，国家则始终经受保守与改革的角力，改革与保守又造成不同国家之间先进与落后的横向差异。差异造成冲突，冲突又必然寻求和解。田边以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将通过种族共荣圈消解，而共荣圈的建立必然且必需依赖一个纵向上的地区霸权，最终实现横向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与整合。无疑，日本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无可推卸的担纲者。

在《中央公论》社举办的座谈则是第二代京都学派哲学家们试图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世界史地位及政治目标做出总陈述的一次集体努力。其中的西谷启治是第二代中的佼佼者，他虽是西田的学生，但也被视为京都学派的创建者之一。1937到1939年他同样受到西田支持前往德国求学，也同样师从海德格尔。他在弗莱堡参加了海氏举办的战时尼采研讨班，这是海氏一生无数研讨班中最重要的之一。海德格尔在课堂上关于欧洲虚无主义和超克西方形而上学的讲法给西谷留下很深印象，直接促使他后来提出对西方现代性的超克。这个观点在《中央公论》座谈会上得到集中体现，两本英文著作的作者因此均将其称为日后日本现代之超克思潮的最初发轫。西谷与其他三位同侪主张以所谓世界史的眼光看待日本获得的民族主体地位：日本绝不仅仅是与西方列强有平等地位的民族国家之一，而且是世界史从地中海阶段、大西洋阶段发展至太平洋阶段的主角；这三个阶段不是简单更替，而是对之前阶段在更高程度进行的辩证统一；日本虽然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但西方的现代化本身蕴藏危机；西方现代化的三大历史进程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将人的救赎完全交给上帝的恩典，文艺复兴则高扬人本主义价值，启蒙运动又强调人对自然法则的理性认识，三者分别偏重于神、人和自然的立场，充满内在紧张和矛盾；日本则能依托西田几多郎以绝对无概念指称的文化精髓，置自身于主体的无或者以无为主体的立场，达至天地人三才的统一，解决科学与信仰、帝国主义与人本主义以及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种种矛盾，完成对现代的超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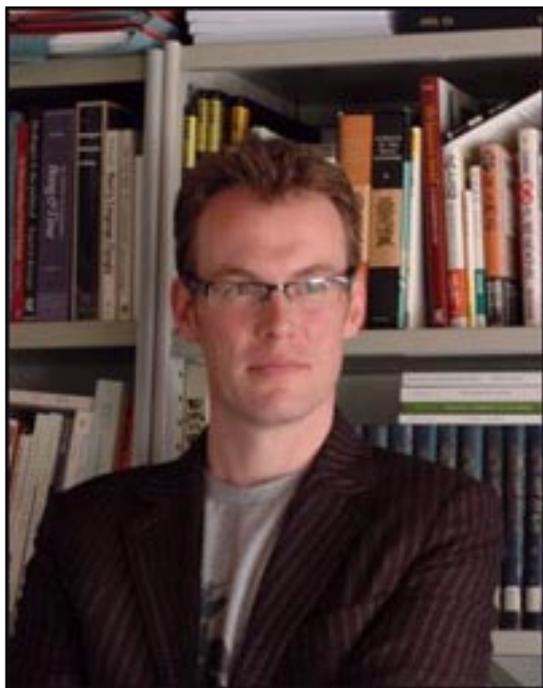
到1942年11月，在《中央公论》社又相继举办了多场讨论，其中两场分别以“大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和“总力战的哲学”为题的会谈于1943年与“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一起结集出版。京都学派哲学家们此时试图为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进行理论辩护。尽管他们出于大亚细亚主义的立场意识到难以为日本侵华找到合理解释，却又强调这场战争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日本继承了欧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如果日本果真承担起世界史的角色，这场战争就具有了道德含义，是日本对亚洲国家的解放战争。太平洋战争更是东洋道德与西洋道德的直接对决，在日军已于中途岛海战中失利的情况下哲学家们仍旧徒劳地用自己丰富的学养为战争作出种种理论美化。铃木成高直接断言：“市民的、资本主义的秩序所构造的国家正在崩溃中，现代的世界观也在崩溃中。……总力战进行于现代之陷于穷途末路。换言之，总力战即是现代的超克。”高山岩男甚至能将佛家思想与战争捆绑，他声称东洋道德就在于超乎善恶相对的大乘立场，而非持善恶相对的小乘立场。西谷启治则一方面以“脱落自我”、“减私奉公”的伦理观鼓吹战时动员，一方面幻想日本也应否定自身私利，考虑别国立场，向世界大同提升。

从近卫文麿受西田等知识精英的大亚细亚主义影响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美丽说辞，到田边、西谷们主动建构共荣圈理论、为战争辩护，京都学派哲学家在急于成为黑格尔一样的时代精神代言者之路上越走越远。到了1943年，西田也更深地涉足政治活动。与此前一直与较为开明的海军高官保持联系不同，这一年他受到陆军邀请参加国家政策研究中心会议。怀着有可能影响东条英机政府的心态他在会上提交了《新世界秩序原理》一文，但文章很快以难以理解为由被退回。西田将文章交给田边，请他加以简化改写。田边改写后的文章被转交给东条英机及陆海军总长，西田则一直担心改写后的文章是否能向这些权力执掌者准确传达他关于日本精神不是囿于国粹、而是具有全球视野的理念。不过无论掌权者们是否理解了他的思想，东条英机于是年11月大东亚会议上的发言很快让他彻底失望。《新世界秩序原理》一文却让西田在战后背上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同流合污的罪名，尽管他已于1945年战争结束前去世。

Goto-Jones在他的著作中将西田视为日本战时一个不成功的政治异见者，极力将他与他的京都学派同仁们拉开距离，试图重新发现其政治哲学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意义。常年生活在日本、尖锐批判美国霸权地位的David Williams更进一步，将田边元和整个京都学派的战时政治哲学视为反抗仍由美国主导的白种文化霸权的思想资源，因此处处为京都学派开脱，强调若干京都学派学者从1942年2月到1945年7月一直与反东条英机的海军将领会面，甚至可能策划了刺杀东条的计划。在这样的思路下这位作者自然也就质疑美国主导的太平洋战争书写史上中国完全无辜的受侵略形象。



然而无论是西田这位失败的政治异议分子，还是可能也怀有一个“和平崛起”的日本之梦的田边与其他京都学派成员，无论他们从理论上构建出多么完美的国家与世界图景，在政治强权和武装暴力面前他们毫无力量可言。西田本人虽然德高望重，从1944年起也因为“过于西化”的言论受到教育部思想审查机关的监视。三木清和日本战前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户润这两位曾经的京都学派成员更是在战争结束前惨死狱中。京都学派哲学家们更无法无视的是军部专制在日本国内及国外犯下的种种罪恶。



尽管知识分子成为权力陪葬的悲剧上演了如此之多，读书人却总是不厌其烦地重蹈覆辙，甚至审视他们那些貌似高瞻远瞩、引领时代的宏论，也不过重复前人陈旧的逻辑。看看国朝那些读过卡尔·施米特的陆地与海洋论便以为把握住了时代脉搏，乃至吊着书袋向海军将领上书的青年学俊，跟试图影响大日本帝国海军的京都学派成员何其相似，看看那些一味复古，把主权在君捡出来说道一番，进而拥护国家威权的新新儒家，与鼓吹天皇主权说、却被实权政客当做棋子的皇道派又何止几分形肖，甚至所谓华夏独具、迥异于西方霸道、践行王道的天下视野又哪里比京都学派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看起来更美？更不用说那位曾主掌国朝《中央公论》，以中国历史文化特殊性批判西方国家发展道路、寻求中国对西方之超克的知名学者，更是直接援引京都学派思想，且不知他是否像那些世界史哲学家们一样清楚意识到所谓超克必须以战争为手段。诚然，思想家们总是为自己准备了好几处洞穴，以便躲避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当他们曾经为之欢呼的历史潮流涌向未曾预料之处时，会立刻使用理论的圆滑将自己与之划清界限，海德格尔便在战后申冤说自己的尼采研讨班是对纳粹的严肃批判。可无论如何，他们都逃不脱对

权力之恶的主动漠视以及成为权力之恶的被动帮凶的指控。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Japan: Nishida, the Kyoto School and Co-Prosperity*, By Christopher Goto-Jones, Publisher:Routledge, 2005.**

***Defending Japan's Pacific War: The Kyoto School Philosophers and Post-White Power*, By David Williams, Publisher: Routledge, 2004.**

图 3 为西田几多郎；图 4 为海德格尔；图 5 为 Christopher Goto-Jones

## BOOKREVIEW 书评

### 一次惊艳的宪政实践：1920 年至 1926 年的湖南立宪自治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mailto:wxy1978@hotmail.com)）

中国近代史迷津密布，1912 年至 1928 年尤其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峡两岸历史观分歧巨大，唯独对这段历史立场一致，颇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意思。军阀割据和猪仔议员，成为对这段历史的固定印象。不仅教科书口诛笔伐，知识分子也是冷嘲热讽。但这无法解释，新文化运动为何会在那时出现，民营经济为何迎来黄金时代，媒体频遭打压为何又能前仆后继？

这几年，对这段历史有较为多样的呈现，又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李洁先生的《1912-1928：文武北洋》多次重印，在文史读者中具有一定影响，在他笔下，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都成为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我理解作者的心情，各路武人亦有各自的家国情怀，不能简单以军阀一言以蔽之，控诉或者谴责都失之简单，但是，讴歌或者赞美，同样失之简单。这种矫枉过正的翻案文章，偶尔读读，可以对冲一下标准答案，多读无益。在做价值判断之前，需要有基本的事实判断。相比之下，钱端升等先生的《民国政制史》、张朋园先生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

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和年轻一代学人严泉先生的《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 1913~1923》都更为接近历史的原发场景。

这些书重在中央或者国家的宏观层面，关于地方实践的内容比较粗略，我对后者尤为关注。鲁迅在《阿 Q 正传》里描绘的阿 Q 和“柿油党”深入人心，公众乃至知识界提到基层民主政治，就想起这篇小说，想到阿 Q 把辛亥革命理解为非法拆迁和调戏妇女，想到未庄把自由党当做“柿油党”。在民主转型之初，这种景象绝非子虚乌有。林达在《如彗星划过夜空》里提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纽约州民众曾经拥护把此前支持英国的“保皇党人”的财产全部没收、拍卖。庆幸的是，美国开国先驱，没有因为人民素质还不够高，也没有因为民主会出现乱象，舍宪政体制，取党国体制。暴力和贿选，几乎是与民主转型如影随形的“乱象”，但这不是什么“民主乱象”，而是“专制乱象”，是民众长期缺乏民主实践的结果。“民主乱象”的说法，是倒果为因。

从未庄的角度观察民主转型，得出的结论多半是让人沮丧的。在未庄这种最基层的地方建制里，士绅、学校、媒体的力量非常微薄或者纯属空白，民主的培育不可能一蹴而就。观察民主转型的地方实践，我更倾向于以省或市为单位。得知何文辉女士的《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以下简称《历史拐点处的记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我就留心寻觅，一直不见踪影，后来在打折书店发现厚厚的一摞，一时不知是喜是悲。

1920年至1926年，湖南出现立宪自治运动，这段历史不仅今日民众闻所未闻，纵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者，也所知有限。如果要为“军阀”翻案，最合适的人选不是《1912-1928：文武北洋》里的五位，而是广东的陈炯明和湖南的赵恒惕。两位都致力于自治，值得专门做传，可惜我目力所及，没有见到理想的著述，只是偶尔有一些文章点到为止。《历史拐点处的记忆》不是人物传记，但是部分弥补了这个缺憾。此外，刘建强先生著有《湖南自治运动史论》，由于尚未见到此书，这里存而不论。如果同样有一本研究广东地方自治的著作，陈炯明也可以瞑目了。

新文化运动之后，联省自治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一种思想潮流，并且进入实践层面。后者常与军阀割据联系在一起，两者有重合之处，但是把它们等同起来，则有违史实。以赵恒惕为例，他曾是湘军总司令，但他还是民选省长，不能简单称为军阀。湖南自治非但不能等同为军阀割据，还与军阀割据有着直接的冲突。立宪自治期间，精简军队是工作重点，军队横征暴敛受到限制，尽管效果并不如人意，却不能得出联省自治等于军阀割据的结论。关于这个问题，胡适在当时就撰文《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指出：“裁制军阀与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联省自治的联邦制。”

1920年7月，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名义通电宣布湘省自治。1920年11月，赵恒惕担任湘军总司令。与此同时，立宪启动。1922年元旦，《湖南省宪法》公布，“非但是联省自治运动中唯一制定成功并公布实行的自治宪法，也是中国政制史上破天荒第一部省宪法”。随后开始议员选举，“这项选举在当时不仅是全中国而且是全亚洲破天荒的一次大范围内的直接选举”。再随后，议员投票选出省长赵恒惕。这仿佛1919年的德国，在中部小城魏玛，德国历史上第一步付诸实施的民主宪法产生。

魏玛宪法应用于整个德国，湖南省宪主要致力于一省的立宪自治。这种自治表现为地方自治和公民自治（何文辉使用“人民自治”一词，《湖南省宪法》既使用“人民”也使用“公民”，在宪政的框架里，我更愿意称之为“公民自治”）两个层面。我们常说，民主不能只是自上而下的引导，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但如果都是从未庄出发的自下而上的进程，很有可能又会成为与民主精神相悖的群众运动。湖南省宪从中间入手，一方面向下鼓励自治，一方面向上推动国宪，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1921年2月，赵恒惕在通电中阐述自治的理由：“与其矜言国宪，致目前之省政，益趋纠纷，曷若早定省法，使将来之国宪解除困难。”

自治常常遭到“分裂”的指控，这种指控恰恰说明中央集权的思维根深蒂固。湖南立宪自治，主要是因为从上而下的由



国宪而省政之路遭遇瓶颈，转而试图开拓由省法而国宪之路，并无另立中央的意图。虽然有“湘人治湘”的说法，但是湘人的范围相当广泛，《湖南省宪法》在第一章总纲里明确说明：“凡有中华民国国籍继续住居本省满两年以上者，皆为本省人民。”也有一小撮人提出“湖南共和国”这种涉嫌“湘独”的口号，但是应者无几，当地的媒体上更是有文章批评这种狭隘的地方主义，“湖南共和国”的提法逐渐沉寂。当时的北京政府对湖南自治保持了某种默许，当记者问及此事，表示“政府为行政机关，非立法机关，此事应由日后之国会核夺”。



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主要分为三步：制定宪法、选举议员、实施省宪，《历史拐点处的记忆》详细讲述了这一过程。

立宪自治使得湖南成为瞩目的民主特区，省内外乃至海内外精英对此非常关注，这跟未庄截然不同。1920年，应湖南方面之请，杜威、罗素和蔡元培、章太炎、张继、张东荪、杨端六、李石岑、吴稚晖等组成的全明星阵容，到达湖南讨论立宪自治。随后以湘籍人士为主的13位学者担任省自治根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后来以《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而闻名学界的李剑农担任主席。在宪法起草之时，赵恒惕“未曾一至起草之地，且未曾一索阅其稿，以示大公”。同其他的制宪过程一样，制宪的程序和内容充满争议，但这恰恰是民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制宪主体，谭延闓一度想由政府 and 议会合办，遭到反对，改由议会办理，又遇到一个问题，选举议员应在制定宪法之后，宪法不能由过去的议会来制定。最后，采纳了由蔡元培提议的学者制宪。

严泉检讨民初制宪，指出制度设计中的诸多缺陷。1912年的《临时约法》没有规范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关系，致使此后府院之争不断。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在制定期间并未受到总统袁世凯的太多干涉，但是在宪法草案二读即将完成之时，袁世凯却公开表示反对。后人常常批评袁世凯缺乏高风亮节，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为主的国会，为了限制袁世凯，因人立法，过度强调国会权力，又过度压缩总统权力，使得立法和行政失调，以致出现“议会专制之奇观”（林徽因父亲林长民语），最终总统采取不合程序的方式解散国会。《天坛宪法草案》使得立法权力独大，形成“超议会制”，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又使得行政权力独大，形成“超总统制”。

在司法独立这块基石尚不稳固的情况下，立法和行政成了一高一低的跷跷板，无法成为天平。我们今天经常批评的民初诸种现象，正是司法、立法、行政未能达成有效分立和制衡所致，如果根据那段历史断定三者不应分立和制衡，应该精诚团结，就南辕北辙了。在制定湖南宪法草案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临时约法》的问题，指出“行政与立法二部之权限，必求

其平衡适中，方不致有一方压制他方之弊”。遗憾的是，草案所拟的责任内阁制在审查时，变成了形似责任内阁制、实为委员会议制的混合体制，以至于议员选举并且可以推翻阁员，阁员却不容易解散议会。

尽管如此，《湖南省宪法》依然修正了《临时约法》的一些问题，《临时约法》第二章列举人民种种自由权利时，章末为：“本章所载人民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这使得权利随时可能以公益、维稳等借口被限制，《湖南省宪法》第二章共十六项规定，有八个“不得”与八个“不受”，其中十五项都是对政府说不，以至于这部宪法被时人称为“十六不宪法”。所谓宪政，首先需要限制政府权力，如果宪法用来限制人民权利，那就是名存实亡的宪法，就会出现“有宪法无宪政”的情形。民初立宪不时犯错，也在不断纠错，与那种专制压倒一切的稳定不可同日而语。

宪法通过之后，进入选举议员阶段。何文辉没有将此次选举过程完美化，她指出漏报、浮报、乱报选民的情形比比皆是，很多选民放弃选举权，选举舞弊和冲突频频发生。但是她没有因此全盘否定选举，而是呈现了经常被忽略或者被改写的另一面。在选举程序设计上，选民须持投票证到投票所换领投票纸，以保证一人一票，避免重复投票。选举冲突固然有人动用拳头，但是人们也开始以法律的方式应对，出现很多选举诉讼案。家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介入代议政治，但是从家族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立场出发，他们也会尽量推选家族精英和地方精英为自己代言，不会推选只会拍掌的弱智。在宁乡县，投票尚未进行就有内定之说，但是最终当选者并非世家子弟，而是最具声望者。在新宁县，动用金钱者落选，具备实力者当选。即使是出售选票，也未必全是归于个人利益，衡阳县某地约定“售票所得，作为地方公益之用”。长沙商会通过社会组织动员选民，开始摆脱血缘和地缘关系。赵恒惕的妹夫李祚辉落选之后，颇为大度，对此次选举称赞有加。军队也非常克制，大都保持中立。在一个没有民主经验的地区，能够出现这种景象，让人有惊艳之感。

实施省宪的过程，更值得称道。《湖南省宪法》正式公布之时，湖南就开放除总司令部以外的所有公署衙门，任人参观。尽管公众对宪法所知有限，甚至不乏民众对此无动于衷，但是议员们绝非“猪仔议员”。何文辉为民选

议会总结了三个特点：一是议员比较有骨气，二是会场秩序出奇的混乱，三是成绩相当的可观。议员的骨气不能单纯归结为议员的勇气，也要感谢各方的操守。归根结底，这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因为议员拥有制度保障。秩序混乱和成绩可观并列，尤为有趣。议员们打架斗殴，当然是不文明现象，但把利益分歧公开化，并非坏事，既胜过议员们所有事情一致举手通过，更胜过暗杀和战争。议会手中握的绝非橡皮图章，省长赵恒惕要求设置警政视察员的提案，也以“财政艰难，不必援引先例增设冗员”为由被否决。

在省宪的保障下，当地媒体非常活跃，旁听议会并且报道会议内容。议会和媒体之间曾经产生直接冲突。1923年4月，长沙《大公报》批评省宪，省议会当天通过临时议案，请求政府“依法惩处”报纸，内务司长致函警察厅长，派警员至报社勒令停刊。《大公报》立即向长沙地方审判厅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内务司长在法庭认定事实之前发送私函指示警察厅长查封报馆，构成行政违法。《大公报》此举获得众多社会团体的声援，甚至获得县议会的支持。湘潭县议会通电各县议会，希望省议会能够取消原议，随后永绥县议会通电规劝：“议会为民意机关，报馆乃舆论代表，议会与报馆名称虽异而其展扬民意则一。……如不互相维护，……将来之以武力解散议会，当亦犹今日之查封报馆也。”在四面楚歌声中，省议会发出通电，划清界线，表示议会只是要求政府“依法惩处”，并未要求查封报馆。当初迎合议会的政府，反而骑虎难下。6月4日，内务司停止对报纸的处分，当天《大公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评论，表示报纸之在中国，“被停被封，乃其本分；不停不封，不成其为报纸”。

可以看出，议会和政府对于宪法精神有待慢慢领会，也会出现一些违宪、违法行为，但是在宪政的保障之下，违宪、违法行为可以得到纠正。为《大公报》惹祸并带来声誉的文章对省宪有激烈批评，称“省宪对于人民的成绩，只加进几层痛苦”，但批评省宪不等于反对宪政，更何况，若非省宪，《大公报》不可能全身而退。1924年，湖南省议会因为叶德辉公开主张废弃省宪，通过提案，咨请政府拿办，叶德辉继续批评议会违宪干涉言论自由。议会的做法值得检讨，但不知三年之后，叶德辉死于非命之时，对当初的观点是否亦有所检讨？

在议会、媒体的监督之下，政府励精图治。1925年3月，赵恒惕召开军政会议，准备精简军队、整饬吏治、统一财政。



裁兵过程并不顺利，各路军官普遍观望，岳阳镇守使下第三十一团团团长刘世涛领风气之先，自请解职。随后，除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大部分军队都进行了精简和改编。整饬吏治则从县长考试做起，考试题目这里可以列举两道，一为“联省实行，制定国宪，对于国会制度，应采两院制乎？抑采一院制乎？试说明之”，一为“地方保卫团，于地方警察，根据法令，究以如何设施为宜”。根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因题目尚易，届时均完卷出场”，但今天看来这种题目堪称难于上青天。同时，还举行了法官考试和警官考试。最为艰难的是统一财政，虽然取得进展，但是唐生智依然拒不执行相关决定。

当事人李剑农曾感慨：“湖南在施行省宪的两三年内，所谓省宪也仅仅具有一种形式，于湖南政治的实际未曾发生若何良果。”施行省宪问题丛生，无可否认，但声称“未曾发生若何良果”，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李剑农作如是说，可能是爱之深、责之切，也可能是与赵恒惕有所分歧所致。这同时提醒我们，要避免对宪政民主的完美主义想象。宪政民主只能不断纠错，不能避免错误，如果以政治乌托邦的标准衡量，无疑是千疮百孔。但是，任何一种政治乌托邦只要成为现实，就会比宪政民主更加千疮百孔。



遗憾的是，湖南立宪自治运动结束不是因为宪政难以为继，而是亡于武力统一的广东国民政府。赵恒惕曾和陈炯明建立军事政治同盟“湘粤联盟”，主张自治，在国民党试图党国一统的进程中，清洗陈炯明之后，湖南是首当其冲的障碍，自然要被定点清除。1922年，湖南省长选举，谭延闿惨败于赵恒惕，放弃联省自治和省宪主张，追随孙中山。1926年，唐生智摇身成为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废除《湖南省宪法》，湖南立宪自治运动夭折。接着，各县初级法院、县议会和省议会被撤销。长沙《大公报》也没有幸免于难，1927年3月被湖南革命政府勒令停刊。唐生智公开表示：“军阀祸国，议会殃民，事实昭然，久成定论”，虽然此前不久他还在口头上表示极端护宪。

1933年，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纳粹德国开始，魏玛宪法名存实亡。从1919年到1933年，德国从宪政转向独裁。在这段时间，中国从民国走向党国。所以，不仅要记住魏玛经验，也要反思魏玛教训，不仅要记住湖南省宪，也要反思为何一党专制代替宪政民主。最后，借用《历史拐点处的记忆》的结束语结束这篇文章：“历史不应当被遗忘，除非对未来已不抱希望。”

何文辉：《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38元。

图3为谭延闿，图4为赵恒惕，图5为《魏玛宪法》，图6为希特勒

## BOOKREVIEW 书评

### 不屈的女杰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 (上海, [sunchuanzhao@yahoo.com.cn](mailto:sunchuanzhao@yahoo.com.cn))



很偶然,2008年6月北京和东京两地的书店几乎同时分别推出同一世代两位女性撰写的、约60年前初版的名著中译本和日译本,这两部著作也是她们的成名作——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6月)和马格利特·布伯-努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Als Gefangene bei Stalin und Hitler, Eine Welt im Dunkel; 日文版《スターリンとヒットラーの軛のもとで二つの全体主義》,林晶译,ミネルヴァ書房,2008年6月,该书1954年就有日文版,与新版相比,缺少原著最后一章“回归故乡”)。对阿伦特及其著述,最近10来中国读者逐渐有所了解;对于后者,也许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还是陌生的。殊不知马格利特·布伯-努曼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是曾对阿伦特后来重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产生过影响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在我国,只有当马克思·勃罗德在卡夫卡的传记中介绍密伦娜时才提起它的书名。《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22页)阿伦特1948年至1949年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前,缺少关于苏联古拉格的材料,所以只把纳粹体制成为“种族帝国主义”,也没有把斯大林体制和纳粹体制一起归结为“极权主义”体制。1951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后,阿伦特读到大量陆续出版的关于斯大林体制下悲剧的回忆录,在1958年第2版作修订时增加了最后一章“意识形态与恐怖”,分析了这两个体制的差异和共性。阿伦特读到的相关

文献中,可以说马格利特·布伯-努曼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是其中对她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力的一部。这些文献使阿伦特相信:这两个体制之间的共同性是都把集中营的恐怖作为其统治体制的核心。马格利特·布伯-努曼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被翻译成11种外国语,它在世界各国为何能赢得那么多的读者?得先从马格利特·布伯-努曼波澜起伏的人生谈起。

—

马格利特·布伯-努曼原名 Gerte Thuring,1901年出生在军国主义气氛浓厚的波茨坦。父亲是酿造业的商人,观念保守,赞成普鲁士民族主义;母亲却是个充满自由主义理想,同情社会主义运动的妇女。在这个父母信仰、立场对立的家庭里的马格利特,喜欢母亲的生活方式,对波茨坦地方的保守空气有一种抵抗感,14岁就参加当时激进的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Wandervogel)。这一源自浪漫主义、追求“内在真实、外表纯洁”、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青年团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更加显示出其社会政治上左翼倾向。所以,马格利特少年时代起热衷于读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著作,关心社会的政治动向。高中毕业后,她进入柏林幼儿师范学校,19岁那年遇到犹太人哲学家马丁·布伯的儿子拉法尔。不久就结婚,生育了2个女儿。可是这一婚姻没有维持多久,1925年出于政治信仰的原因,她与拉法尔分手,因为党组织不赞成她与拉法尔的婚姻。1926年正式加入德国共产党。至1928年法院把抚养权判决给拉法尔为止,是马格利特单身抚养两个女儿。直到19年后的1947年她才与女儿重逢,再次成为真正的母亲。

通过马格利特的姐姐巴贝特(Babette)的介绍[巴贝特是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曾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威廉·缪齐伯格(Willi Münzenberg)的妻子],1929年马格利特开始与海因茨·努曼同居(虽然没有正式结婚,马格利特以后一直在自己名字前冠

以努曼这个姓，也没有取消布巴这个前夫的姓)。海因茨·努曼是 18 岁那年 (1920 年) 入党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已经是德共的领导人之一，被看作台尔曼的接班人，也算是德共干部中为斯大林信赖的一个。他柏林大学毕业，会多种外语，24 岁就当选中央委员，29 岁成为第三国际执行局候补委员，即使反对派也称他“神童”。1927 年 11 月斯大林将海因茨作为他为共产国际代表派往中国，领导广州起义。海因茨非常激进，反对妥协，主张与社会民主主义、纳粹主义两面作战，1930 年代初斯大林改变外交路线，转向与希特勒搞“统一战线”的时候，努曼还是坚持它的反法西斯立场，所以，很快莫斯科方面对他失去了信任，认为他是异端，是托派。1932 年德国共产党政治决会议和共产国际执行局会议上，他已经失势，受到批判，同年，海因茨携马格利特访问苏联，虽然得到礼遇的接待，但是，年底就被派遣到西班牙去从事宣传工作。1933 年，海因茨和马格利特在去西班牙途中，因缺少盘缠在瑞士滞留，期间被瑞士警方逮捕。瑞士方面拒绝纳粹引渡要求，关押了 2 年后应苏联要求，把他们送回了苏联。因为苏联内务部得知海因茨给巴黎的威廉·缪齐伯格的信中曾表示坚决反对与德国纳粹政权结盟的方针，要求海因茨返回苏联。那时候正值莫斯科审判高潮时期，海因茨和马格利特虽然被安排在第三国际的出版机构里工作，可是处境已经今非昔比，每天处在恐惧之中，因为他们许多老共产党员的朋友都已经被处死。一天，第三国际领导人多米特洛夫把海因茨叫去，要他作自我检讨，写赞成苏德友好外交政策的文章。海因茨坚持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场，拒绝了这个要求——“等于在判处自己死刑的判决书上签了字”——未几，1937 年 4 月 26 日被逮捕，11 月 26 日被枪决。他的连襟威廉·缪齐伯格因为坚持在巴黎从事反法西斯宣传活动，也被莫斯科召回，但是威廉·缪齐伯格拒绝去苏联。1940 年在巴黎被暗杀，暗杀的真相至今不清楚，但是不少人在回忆录中都怀疑是莫斯科特工下的毒手。

一年后，1938 年 6 月 19 日马格利特自己也被苏联内务部逮捕。马格利特认为从海因茨入狱后到自己被捕的这一年，比以后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的 7 年生涯更为艰难，是人生中最难熬的岁月。这一年里，她辗转各个拘留所、监狱，排长队打听海因茨的下落；往监狱里不断地送钱，想改善海因茨的处境。另一方面自己失去工作，没有护照不能离开苏联，只能靠变卖衣服度日，所以当被逮捕的时候，有一种解放



感。马格利特最后被以“社会危险分子”罪名判处 5 年徒刑，送往哈萨克斯坦的沙漠地区的卡拉戈德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里给马格利特深刻的印象是两条：超过人们想象的重体力劳动和缺乏粮食饥饿。苏联的集中营，有着沙俄时代的古老传统：不仅为具有恐怖政治的功能，还是整个经济体制的生产力重要一环，是奴隶般劳动力的供应源泉。如果说纳粹是把集中营囚徒作为非人类处理的话，斯大林体制集中营是把他们作为劳动奴隶。这一印象和以后托多罗夫在《恶的记忆·善的诱惑》(Tzvetan Todorov, Mémoire du Mal Tentation du bien, Enquête sur le siècle, 2000)、安妮·阿普鲍姆在《古拉格》(Anne Applebaum, Gulag, 2004) 等著作中比较苏俄集中营与纳粹集中营不同之处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而且，苏俄集中营有着更长的历史，纳粹从中学到不少东西。马格利特战后谈到集中营中艰难生活对人格影响：“基督教主张苦难能使人灵魂净化，但是集中营生活实践结果恰恰相反，没有比过度的苦难更为危险的事物了，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民族。”因为当人的身心

受到极度摧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迫害自己的人的价值观。

在卡拉戈德集中营度过1年后，1940年初马格利特被转移到莫斯科监狱，没有几天。2月8日清早就和那里的30名德国、奥地利的难友一起被送往西去的列车。他们都以为可能在交给某个中立国将他们释放，但是，马格利特·布伯-努曼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里是如此回忆那天中午难忘情景的：

1940年2月8日中午，在布赖斯特-利特拉的那座伯格桥上，30个囚犯由苏联内务部警官引渡给德国的党卫军军官。那时候，布赖斯特-利特拉已经不属于波兰版图中的国土，成了苏联占领地和德国占领地的分界线，德国占据了波兰布赖斯特-利特拉以西的国土，苏联占领了东边。2个女的和2个患病的男犯人是从小布赖斯特-利特拉火车站坐了卡车来到桥上，其他人是徒步走来的。30个囚犯都是说德语的德国人或奥地利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是信仰社会主义左派，3天前从遥远的莫斯科出发，乘列车被押送到这里。其实关押他们的集中营比莫斯科更为遥远，他们被从各个囚禁的边远地区集中营押往莫斯科汇集后再一起出发的。他们中大多数是前几年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到苏联寻求政治庇护的左翼犹太人，可是他们到了苏联后不久或被逮捕，或被判处徒刑。这些30名囚犯逐渐看清从桥对面走过来的军官的党卫军制服，开始骚乱和反抗起来。当苏德军官对照名单完成核对、接收手续之际，其中3个男犯人都因坚信到了党卫军手里会被处死，激烈反抗挣扎。当然这是徒劳的。反抗的3人中：一个是匈牙利出身的犹太人；第二个是个德国语文教师、德共老党员；第三位是个德累斯顿的青年工人，在德国参加过反纳粹的武装斗争。这些逃往苏联的共产主义者昨天是斯大林的囚徒，今天落到了希特勒党卫军的手里。

马格利特·布伯-努曼就是这个场景中身历其境的2个女囚中的一个。1939年至1941年春是苏德刚签订了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的蜜月时期。苏维埃政府为了讨好纳粹政府，同意引渡已经被关押在苏联集中营里的从德国、奥地利逃往苏联的大约1000名左右的政治难民，其中三分之一是犹太人。这1000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仰者、左翼政治犯的最后命运，现在已经难以完全搞清楚，但是，有两点已经为历史证实了：一，当他们被斯大林关押起来之后，都先后对原先信仰的意识形态感到幻灭；二，他们最后的归宿，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类：一部分被杀害，一部分在集中营里死亡。马格利特·布伯-努曼算是其中的幸运者，也就是在纳粹集中营里等来了解放的幸存者——她1945年3月，在苏军到达集中营前走出了柏林以北80公里的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徒步西行2个多月，历尽艰险回到了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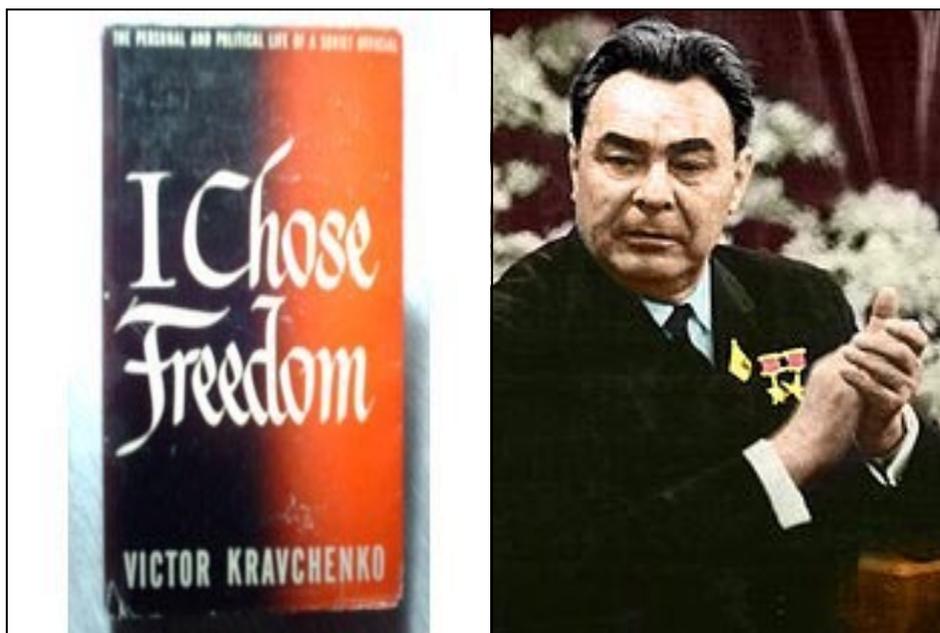
1940年，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关押的5000多名女性，她们或是政治犯、犹太人、吉普塞人，也有部分刑事犯，但是到了终战前夕，收容了2万5千名女囚。里不仅有被党卫队处死、酷刑、饥饿、毒气室的威胁，还要遭到不少德国、奥地利的共产主义者囚犯的迫害。这些人都把持着集中营里囚犯中的“领导权”，把她和其他从苏联引渡回德国的原先“战友”，看作叛徒、托派，把他们所说的在苏联的见闻与经历说成谎言，或像躲避瘟疫那样孤立他们，或者生活、工作中刁难他们，总之，他们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祖国——伟大苏联”的敌人。幸运的，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关押的政治犯女囚中，有一位难得的难友。她精神上给了马格利特生存下去的勇气，因为她也与曾亲历斯大林体制带来的人生巨大灾难的马格利特一样，对希特勒体制和斯大林体制都有着刻骨铭心清醒认识——她就是捷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女杰、著名的记者密伦娜·叶塞斯卡。密伦娜对马格利特约定：“如果我们再度获得自由的话，一起写本书吧！书名就叫做‘集中营的时代’。”遗憾的是密伦娜因为肾病1944年在集中营里去世，未能迎来重新获得自由写作权利的那一天。

1946年至1949年，马格利特国际援助组织招聘去斯德哥尔摩工作3年。在这3年间，她没有忘记密伦娜的希望，把写作“集中营时代”作为自己使命和义务。1948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瑞典文版最初问世。

然而，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的欧洲，斯大林主义还很有影响力。因此，马格利特及其著作遭到过苏联当局和欧洲斯大林主义者（特别是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攻击和诽谤。

1943年从苏联逃往德国的克拉夫契科（Victor Kravtchenko）的揭露斯大林主义罪恶的《我选择自由》的英文版、法文版在1946年、1947年先后出版。法国共产党的《红色人道报》发起所谓谴责克拉夫契科谎言和诽谤的运动，1949年克拉夫契科向巴黎法院提出该媒体对其名誉损害、诽谤的起诉。为此，法院指定了有在苏联集中营经历的20名证人出庭作证。马格利特也是这些证人中的一位，因为她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已经公开出版。因为马格利特作为一个女性的证言、作品的具体和生动，很难采用否认事实那种法庭辩论战术，所以，被告《红色人道报》的律师辩护团采取避免关于真实性的辩论、着力于道德上否定马格利特人格的战术：他们对4位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幸存的捷克人证人“做工作”，要求她们证言马格利特是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奸细。最终这个诡计没有得逞，因为有更多的法国、挪威的证人提出了否定这4位捷克人所谓马格利特是党卫军奸细说的证言，因此，原告克拉夫契科胜诉，也是马格利特的胜利。尽管如此，这一诉讼给马格利特带来极大的惊讶和困惑。她对诉讼中的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四名捷克证人之一的印科（Inka Katnarova，进集

中营前是医学院学生) 虽说是原捷克共产党党员, 但是在集中营时候也表现出对斯大林体制的厌恶, 更重要的, 她曾冒很大危险偷了药治好了自己的病, 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为何会诬陷自己为纳粹的奸细? 20 年之后, 这个谜才彻底揭开: 当时法国共产党通过捷克政府找证人做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证言, 捷克政府在布拉格找到了印科。印科正值产后住院中, 受不了政治上高压, 就在证言笔录上签了字。印科因参加 1968 年布拉格之春斗争, 被开除了党籍。也是这一时期, 印科读了 1967 年出版的马格利特的另一著作《世界革命的战斗: 第三国际: 1919-1943 的报告》(Kriegsschauplatze der Weltrevolution, ein Bericht aus der Praxis der Komintern 1919-1943, Stuttgart, Seewald Verlag), 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内疚, 决心有生之年务必要当面向马格利特道歉, 承认自己的懦弱和过错。1986 年印科到巴黎出席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幸存者国际会议, 不顾自己没有德国入境签证坐车越境, 去法兰克福见马格利特、请求她原谅。遗憾的是马格利特已经 85 岁高龄, 老年性痴呆已经让她记忆不起所有的往事。结果, 印科对自己 20 多年前在克拉夫契科诉《红色人道报》诽谤案中, 为被告作证言笔录上的签字留下了终身的悔恨。稍后 1949 年, 纳粹集中营亲历的幸存者、作家戴维德·卢瑟 (David Rousset) 在巴黎成立了苏联集中营问题调查委员会, 也引起法共《红色人道报》



的批判, 卢瑟被指责为了进行反苏宣传, 诱导纳粹集中营受害者变成纳粹的同盟者。当时具有很大影响立法共《红色人道报》否定苏联存在集中营, 梅洛·庞蒂和萨特联名发表题为《我们生存的日子》一文声援《红色人道报》, 声称: “即使经历过集中营的体验也不能绝对地作为决策的依据”, “只把批判的矛头针对苏联的话, 就是想要抵消资本主义所遇的罪恶。……这样的话, 是要把无产阶级投入绝望的深渊。” 为此, 卢瑟作为原告对《红色人道报》提出名誉损害的起诉, 最后

获得胜诉。这次诉讼中, 马格利特也作为证人——苏联集中营亲历者为卢瑟作证。在美国的汉娜·阿伦特关注卢瑟诉讼案, 1952 年开始写一些札记, 2 年后把它们整理成一个报告——《对最近欧洲政治思想的关注》, 向美国政治学会提出。在这篇文章中, 她概述了对极权主义的恐怖的各种哲学的反应。她赞赏加缪和马尔罗依然坚持“拼命反抗将自我虚无主义那种古老美德”; 对萨特和梅洛—庞蒂的虚无主义的反应, 她进行了严厉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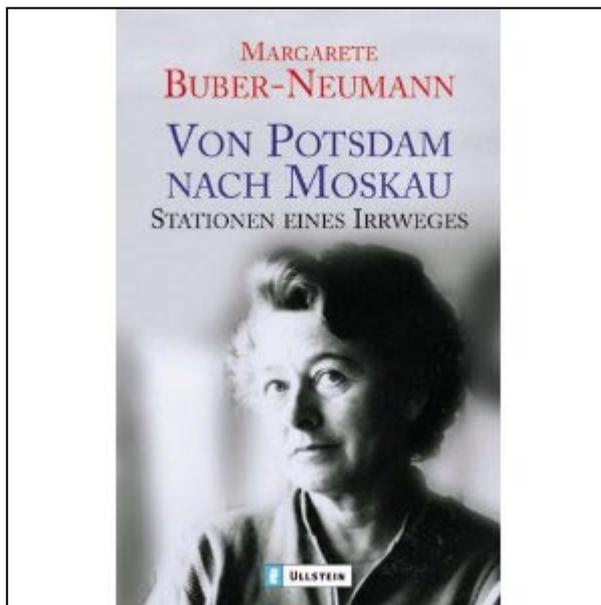
作为哲学家, 法国的存在主义者竟然是这么认识的: 革命行动、即仅仅是虚无的世界革命的意识就能解决人类与世界不正常关系中固有的虚无。就这点而言, 对本来的各种问题没有指出任何方向。……本来驱动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力量, 几乎都不来自马克思主义, 但是不知他们怎么一下子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 把两者结合起来, 那是因为他们从自身的哲学出发, 幻想解决一切问题的性格的缘故。所以我们不必感到奇怪: 他们本质上是从完全同样的论据来议论, 一离开虚无主义的死胡同, 在政治领域马上表现出与自己观点完全不同的立场。在行动领域, 只要是属于革命的变革,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得到他们的认可。(p.281-282)

阿伦特、马格利特著述的都超越了冷战时期善恶二元论。她们的著作在 1960、1970 年代遭到欧洲、特别法国的左派的攻击, 至今, 仍遭到新一代左派攻击, 因为他们与前辈一样都不愿意看到把斯大林体制和希特勒体制相提并论。托多罗夫在这两个诉讼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后, 继承了阿伦特这个传统, 在 1990 年代以来诸多的著述中批判善恶二元论, 特别在《恶的记忆·善的诱惑》一书中, 十分推荐马格利特·布伯—努曼及其《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 把她与戴维德·卢瑟、瓦西里·格罗斯曼、罗曼·加里和普里莫·莱维 (Primo Levi) 作为 20 世纪坚持与极权主义做不屈斗争的英雄。他强调: “明确区分真和善, 拒绝用道德抽象代替对世界的客观认识”; 拒绝像萨特那样“把这种理想当作理解现实的一个工具”, 否定了萨特从道德教条出发的政治伦理观。托多罗夫看来, 马格利特著作正是强化了战后在法国知识分子中被边缘化的声音。在《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一书中, 他更直截地批评萨特在现实中的各种政治表现, 特别是厌恶他把乌托邦理想信仰寄托于

自认为唯一可能实现的苏联，无视苏联存在劳改营等客观事实的态度与立场。

战后马格利特积极参加阿瑟·凯斯特拉 (Arthur Koestler)、梅尼斯·斯普巴 (Manes Sperber) 等人组织的政治活动，组织援助极权主义体制受害者委员会、支持东欧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活动，同时不断地写作。1957年出版了另一部自传性作品《从波茨坦到莫斯科：迷茫的阶段》(Von Potsdam nach Moskau, Stationen eines Irrwegs)。以后她的写作风格有所改变，《共产主义的地下运动》(Der Kommunistische Untergrund, 1970)、《熄灭的火焰》(Die erloschene Flamme, 1976)、《自由为咱们所有》(Freiheit, du bist wieder mein, 1978)，与记忆相比更注重历史文献，生动地记叙了国际共运的变迁历史。80岁那年西德政府授予她十字功勋奖。1989年11月就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她与世长辞，享年88岁，结束了波澜起伏的一生。

马格利特生前还践行了当年自己与密伦娜另一个约定——要写一本书献给密伦娜，而且这本书也是当年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生涯的证言，不同的它不是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而是从第三者的立场叙述主人翁密伦娜的生涯。马格利特感谢密伦娜，与密伦娜的集中营邂逅改变了她的后半生，给了她生的希望和勇气。在密伦娜去世后，马格利特甚至一度感到人生就此失去意义了，几乎要丧失继续追求自由的希望。这本将自己的见闻、记忆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构成的传记，就是1963年出版的《卡夫卡的恋人：密伦娜》(Kafkas Freundin Milenna)。这本传记与密伦娜的女儿亚娜、密伦娜的友人沃德拉契科娃写的传记结合起来阅读，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一个完整的密伦娜。



## 二



卡夫卡在几个交往过的女友中，认为密伦娜对自己最能敏锐地完整的理解，所以在完成他的主要作品之后，会把自己的日记全部交给密伦娜，说明对她的爱和信任。卡夫卡曾这么评价道：“她是我至今未曾见过的活生生的火焰。……而且是个非常温柔、勇敢、聪敏的女性。她可以牺牲一切，不！也可以说通过牺牲来获得了一切！”这样火焰般的热烈和牺牲精神，密伦娜在少女时代就表现出来的追求自由的精神，自始至终贯穿于她的一生。

密伦娜作为长女，1895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父亲杨是个医术高超、著名口腔外科专家、医学院教授。父亲脾气暴躁，也因为密伦娜任性、倔强的性格常常遭到父亲的责备、殴打，密伦娜做出的对抗，往往是离家出走，投宿于旅馆。13岁那年，温柔、病弱的母亲离开了人间，密伦娜在家里少了一个庇护人。另一方面，父亲让密伦娜能接受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她就读于一所注重希腊语、拉丁语古典文献、人文教学的高中 (Gymnasium)，这种高中是那个时代奥匈帝国内德语文化圈的教育制度的特色。毕业后在父亲强迫下在医学院学了一年。当医生不是密伦娜的志向，因为家境富裕，她经常出入美术馆、音乐厅，读小说过着放浪生活，由此结识一位在布拉格工作的银行职员、德国犹太人爱隆斯特·波

拉克。波拉克也受过良好人文教育，有很高文艺鉴赏能力。是在波拉克身边清一色说德语犹太人交友圈里，密伦娜认识了马克思·勃罗克 (卡夫卡的好友，遗稿整理者)、奥斯卡·巴姆、威廉·哈斯等人，经常与他们通宵达旦、高谈阔论地讨论文学和哲学。也是再通过他们认识了卡夫卡。后来密伦娜把卡夫卡的《变形记》等3篇小说翻译成捷克语，成了他俩通信往来的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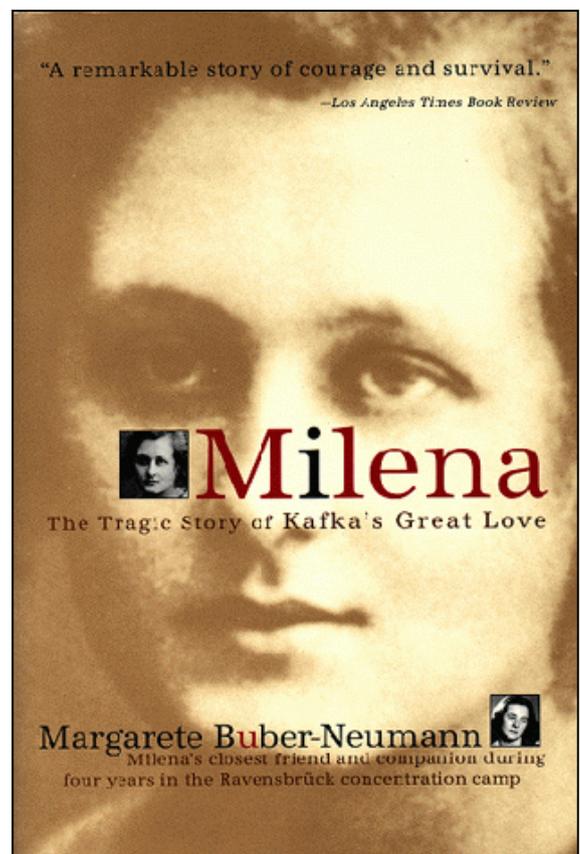
机。同时因为波拉克浪费挥霍，不承担家庭的生计，密伦娜开始为布拉格的《读者报》(Tribuna)写稿。与犹太人波拉克的恋爱遭到父亲强烈反对，被父亲强行送进精神病医院，虽然她很快逃了出来。密伦娜不听父亲劝阻，与波拉克结婚后去了维也纳，几乎断绝了父女关系。可是，不久，与波拉克的婚姻就产生了破绽。1925年，她和第二个丈夫、军官克萨瓦·谢夫科奇从维也纳回到阔别7年的布拉格，为了生计，密伦娜在《国民报》(Narodni Listy)任妇女专栏编辑，开始了她的新闻工作生涯。然而，这第二次婚姻也没有维持多久，因谢夫科奇不适应布拉格生活，与密伦娜分手回维也纳，以悲剧告终。

第三个丈夫雅罗米尔·科莱扎尔是个建筑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热爱苏联。为了援助苏联的建筑工程，曾单身去苏联工作两年。其间，受苏联内务部分配给他的一个女翻译诱惑，回到捷布拉格就与密伦娜离婚。这第三次婚姻对密伦娜人生的影响最大：其一，受科莱扎尔影响，密伦娜开始接触左翼读物，并于1931年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捷共的《创造》(Tvorba)写稿。其二，密伦娜在妊娠中得了败血症，为了止痛，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使用吗啡，染上了毒瘾。尽管受尽病痛折磨，最终还是安然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也算一种人生安慰。1936年9月，因为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内部清洗、苏德两国日益接近，密伦娜毫不犹豫离开了捷共。更主要的，那5年间，密伦娜已经感到党内生活缺乏个人自由、人格独立的余地，组织纪律、宗教般的约束与自己的放荡不羁性格难以共存。密伦娜曾是第三国际成立初期第三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但是，很长一段时期里，许多捷共党员不承认这个事实，密伦娜在捷共党史里湮没无闻。因为离开党就意味一种背叛，密伦娜暗中被视为托派分子。1936年其她转入《现代》月刊(Pritomnost)工作。1939年3月14日——德军进入布拉格，她和《现代》编辑部的同仁就准备好奋起反抗。这里俯拾几个典型事例。1936年3月22日在《现代》上刊出的密伦娜写的关于德军进驻布拉格报道：

8点半正值孩子们上学、员工们上班的高峰，电车与往日一样拥挤，我感觉不到人们有什么异常，只见他们沉默地站在车上。唯一异常的，街上不见行人，在哪个办公室里，人们都没有从写字桌上抬起头来。……9点半，横贯布拉格的大道上，军车隆隆而来，此时街头涌满的人群，谁也不挥手欢迎……也不知道为何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样的反应。怎么会有迎合的情感呢？为何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都是表现出这样的神情呢？例外的是，那些德国血统的人们欢迎德军到来。

当然，德国占领当局很快实行书报审查制度。密伦娜他们的战术也发生了变化：利用官员无知，往往采用夸张手法打点令人发笑的“擦边球”。最后一次“擦边球”是密伦娜写一篇介绍德国军歌的文章。她在文章里说，与捷克军歌相比，德国军歌如何、如何雄壮，可是，在列举的国军歌时，故意搞笑地把布莱希特剧作《三枚硬币》中“士兵坐在大炮上”的插曲也作为德国军歌。但是很快被一位也有很好人文教养的纳粹审查官员发现了。这个平时装得彬彬有礼的德国官员对密伦娜咆哮：布莱希特不是共产党吗？“士兵坐在大炮上”只是那剧中插曲，怎么是德国军歌呢？你不要再耍这种小把戏了！为了此事，1939年6月密伦娜被取消写稿资格，2个月后《现代》也被取缔。密伦娜和同事们又冒了生命危险办了一个地下刊物《斗争》(Boj)。密伦娜另一个行动，是不断积极救援犹太人，偷偷地把他们送出国境。在占领当局规定犹太人要佩戴黄色六角星的袖章后，为了表示反抗和嘲笑纳粹，密伦娜做了一个这样的袖章，佩戴了走上街头——谁都知道她根本不是犹太人。这样一个女勇士，怎么能为占领当局容忍下去？1940年9月密伦娜被盖世太保逮捕，10月被移送到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那以后再也没有与女儿、父亲见上一面。

在集中营里，密伦娜高昂不屈的态度，经常不受集中营内纪律约束，不仅在难友中有相当号召力，就连德国女管理人员也对她刮目相看。她勇敢、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负责管理病历卡时，为了不让患梅毒难友进毒气室，为她篡改验血报告；还为营养不良难友去食堂偷食品……等等。集中营里的德共党员们歧视、欺负马格利特的时候，她与马格利特成了好友。进入集中营后密伦娜健康日益恶化。虽然集中营里的医生特莱——他父亲的学生为她做个一个肾摘除的手术成功，好转几天后，终因败血症在1944年5月17日与世长辞。



在纳粹集中营里九死一生的忠诚的捷克共产主义者，战后在重建社会主义捷克过程中，遭到清洗。在集中营里把马格利特、密伦娜看作叛徒的希尔特·塞因克维亚战后任捷克斯洛伐克卫生部副部长，1950年因为对新生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失望而自杀。在集中营里，密伦娜见到原先熟人——因为营养失调骨瘦如柴的捷共党员卡伦德拉，冒着危险让人带纸条问卡伦德拉需要什么帮助？遭对方拒绝，但是没有料到卡伦德拉居然也活着1945年走出集中营，回到布拉格，可是不久就被逮捕，这次是被捷共逮捕入狱了。

如果把施泰因、韦伊、阿伦特作为犹太人的三个哲学领域女杰的话（德纳米《黑暗时期三女哲》，新星出版社，2008年），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密伦娜、马格利特和阿伦特作为20世纪反抗极权主义的三女杰（密伦娜和马格利特年龄与施泰因、韦伊也相差无几）。这三女杰有她们的共同点，比如，丈夫都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受丈夫影响关注起政治来；从小就有坚持自己主张的性格，在婚姻问题上也都不顾家长反对，我行我素地“反叛”（马格利特父亲因为两个女儿入党，把她们从户口除籍；阿伦特母亲也对她第二次婚姻很不满）；她们三人都曾在媒体工作过，通过不屈服的写作，追求真实与正义。都有集中营的经历（阿伦特因为是犹太人，在法国一度被维希政府收容审查，进入古尔收容所）。也许这样的个性、个人经历也是她们会对以集中营为标志的恐怖手段维持着的体制、对暴徒和精英的结合体制各自显示自己力量的源泉。密伦娜的可贵，在于大胆的政治实践；马格利特的勇敢，表现在敢于否定自己早年人生经历来告诫世人；阿伦特则无疑是20世纪对极权主义体制有深远洞察的学者。

图1为马格利特；图5为克拉夫契科；图7为卡夫卡与密伦娜

## LIVESPOT 现场

### 突然降临的“马勒”!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mailto:veron.cq@gmail.com)）



笔者孤陋，从未在现场领教过汤沐海先生的指挥，不过常有友人向我称道，说汤是国内难得一见的指挥家，当年汤在国交出走一事，北京乐迷一片挽留之声，足可见汤在本土乐迷心中地位，而2000年在国交指挥的布鲁克纳第九这样的大部头作品也成为大家公认的纪念碑之作。

直到今天，国内交响乐团在曲目开创性上，似乎还不及10年前，这自然是有多方面原因，一则乐手素质尚不足以驾驭复杂的深度作品，二则是这些作品在公众接受度上还有不及，有吃力不讨好之嫌；最终或许还是因为指挥与乐团在音乐发展方面缺乏远见，“好高骛远”虽有力不所及之速，但却能够让乐手在失误中成长，相较西方多层的音乐教育与演奏机制，

中国的顶尖乐团则明显缺乏“基层干起”的演奏经验，虽是正规军的头衔，其实仍然是杂牌军的实质。这里顺便赘言两句，如波士顿交响乐团在波士顿一地自然是至高无上，但是在其周围，还有Zander的波士顿爱乐（甚至ZANDER的马勒经常被评论为“神作”，比BSO更强），另外则是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青年交响乐队，更是频繁地免费演出，我初到波士顿，系里的一位爱好古典音乐的老师就郑重向我推荐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免费演出，我虽后来由于演出太多，未有体验，但是仍然频繁看到他们的广告。一地的音乐文化，最绚烂之烟花固然美矣，但是文化毕竟是代际成长与延续的事业，不可作为私器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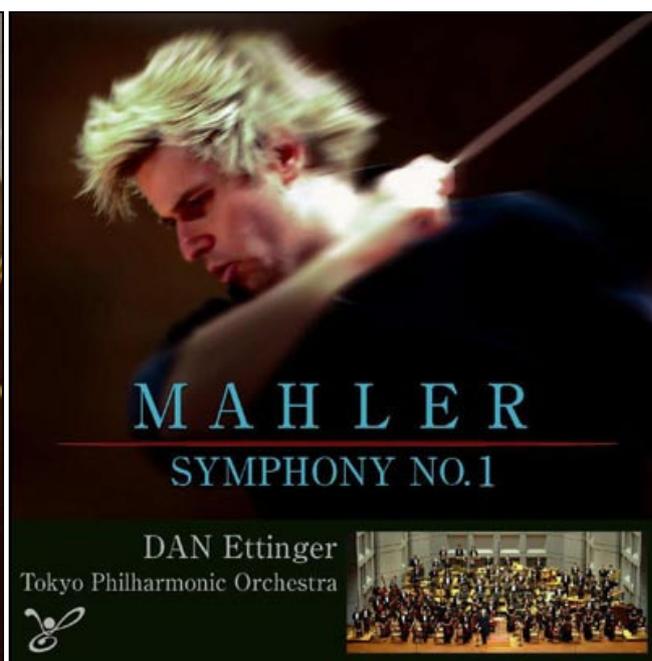
占，中国今日的文化蹒跚之势，归结为“西化不足”或许并不让人信服，归结为体制如今也很难周全地解释现状，或许问题有时候很简单，少数拥有资源的文化事业把持者能否有“文化之为公器”的胸怀，其实是今日文化发展迟迟无法打开新局面的关键，毕竟当年蔡元培依靠一己之力，就能造出个“新北大”。

闲话不赘，这次瞄准上海爱乐的马勒第一已有多日，一则是想近距离地再次观察本地乐团，二则实在是羡慕于汤沐海的”盛名“。开演前演奏的加蓬共和国总统与某作曲家合作的两首钢琴协奏小品这里不多言，十分清新，不古怪，也不实验性，作为暖场作品的噱头，或许意义仅在于此。接着是张晓鸣的黄河钢琴协奏，这位小朋友年少却气派十足，毕竟是闯南闯北，见过世面的。至于作品演奏本身而言，让这位 10 几岁的孩子来驾驭这样一首“社会主义美学“作品，未免有强人所难，尽管张晓鸣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但是钢琴与乐队之间的比重差距仍然强烈感受的到，未免让人认为汤指挥与乐队在“以大欺小”。

为了写这篇短评，笔者还专门重温了一下殷承宗在文革时期演奏黄河的视频，殷那种“神魅附体”的演奏方式与气势或许只能说是“特殊熔炉下的特殊产品”，今天要想在这个维度上突破，难矣！而且我也常疑惑，“黄河”这首作品，到底所欲表达何物？黄河大合唱+东方红+国际歌到底等于什么？“黄河大合唱”或许代表 1930 年代之后的民族主义情绪，东方红则是救世情绪，最终到国际歌，则是一种强烈的普世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三者从内在逻辑而言，其实是层层推进，一脉相承，我并不知作曲者是否有明确意识，但是或许这种由民族主义--领袖救世论---世界大同的思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精神线索。不过今天演奏“黄河”，我们常将这一作品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作，而并没有在这三者之间的张力之间过多着眼，比如“黄河愤”中开篇的“丝竹之声”，从配器上的确可以起到异军突起之作用，但是放在整个乐曲之中，他应该是往第四乐章整体描述“黄河”——“东方红”——“国际歌”过渡的关键部分，民族的如何由民族领袖带领往世界主义的转变，这种思维的转换，是应该放在乐思的铺陈之中的，而这一点，或许常为演奏者所忽视。

这次上海爱乐以马勒第一压阵，对于如今的乐迷而言，或许已经不再那么新奇兴奋，毕竟这几年马勒作品的频频上演，马勒不再神秘，但是无论如何，演奏马勒毕竟是一项重大的考验，新奇过后，我们或许会有更多的“要求”，这对于任何一支想尝试马勒的乐队而言，无疑都是需要认真面对的。

总体而言，上海爱乐的开篇并不成功，当然也因为昨夜现场不知何故，出现许多小朋友，制造出许多噪声，致使慢板乐章远无那种悠远的意趣，长笛声有时候伴随着观众席“比较猛烈”的咳嗽声，以致于开篇的意境基本无法呈现，当然，对付这样的慢板乐章，据我有限的体验，也似乎并不是上海爱乐的长项，也非汤沐海着意表达的部分，又如第三章葬礼进行曲，本应有相当的讽刺与沉重情绪，今天上午我专门聆听了伯恩斯坦、阿巴多与 Tennstedt 的第三乐章，当中刻画的沉重与跳跃的讽刺意味是一目了然的，而上海爱乐昨夜的演绎，却淡化了这种情绪，慢板乐思的铺陈，的确是一项考验，但是对于马勒这种虽然表面上大配置的交响作品，他思想中神秘的“回归童年”与“自然”的意趣，却是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主题，主题的宏大是要与静谧相映衬才能完整呈现。而这一点上，上海爱乐仍然有支离之感。但是转入第四乐章，上海爱乐突然如神



魅附体，产生某种难以言状的“质变”，150人的乐队突然音色大变，仿佛让我听到某种“国际名团”的音色，弦乐不再为“哀怨”的难以表达而苦恼，反而是高歌猛进，而且汤沐海拿手的“直捣黄龙”此时也表现得十分显眼，一向疲软的铜管部分，此时在众人齐奏中，也似乎发挥超常，尽管不免仍感觉到高音时的走音细节，但是从整支乐队的配合而言，第四乐章已经让人难以置信，10几分钟的第四乐章简直让前三乐章的缺陷完全消散，快步地登堂入室。我一直在思考这种“变质”的原因，从现场的体验而言，第四乐章仿佛是突然看到一个整体的乐队，而不再破碎支离，或许是汤沐海的调动能力，或许是乐队对第四乐章的这种层层推进特征有相当的熟悉了解，以至于能迅速完成转变，让我们看到一支具备“马勒魔力”的乐队突然降临，有如魔法，真是不可思议！

当晚的演奏，总长45分钟左右，相比一般名家指挥的50多分钟相比，仍然属于“赶工”的作品，但是这或许也是因为指挥想避短扬长的不得意之举，马勒作品的慢板、行板，意趣的表达，非一日所能完成，就像我们如何理解布鲁克纳作品里遥远的号声从后方传到前方的那种悠远，马勒音乐中虽然没有布鲁克纳那么明显地将“自然的四方平面空间感”与“上帝的垂直超越感”组织在一起，但是马勒早期作品中那种聆听远方“号角”的特征仍然十分明显，要想完整表达马勒，这或许仍然是有待认真对待的方面。但是汤沐海却能将马勒的那种暴风雨与层层推进叠加的音乐特质表现出来，这并不是以“声响”取胜，而是充满层次的步步深入，这样的“暴风雨”让人产生体验的丰富感受，而当晚的第四乐章，的确让我感受到这一点，这是我本无期待，但却真正听到的声音。

图1为指挥汤沐海先生

## ESSAY 随笔

### 救援队与志愿者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上海，[xiayouzhi1997@gmail.com](mailto:xiayouzhi1997@gmail.com)）

两年前的教师节前，温家宝总理邀请几位老师参观中南海，其中有映秀小学的校长谭国强。谭校长穿了一件西服，还打了一条蓝色的领带，但从新华社发的照片看，神情仍然和4个月前差不多——我碰到他的时候，他浑身尘土、血迹和酒气，脸上一副麻木不仁的表情。心理学上说，这种表情是对心理创伤的保护性反应。谭校长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200多名学生



和20位同事。遇难的孩子小小的身体摆满了映秀小学的操场。经过反复检测，仪器再没有在那里发现生命迹象，搜寻和救援的工作已经中止，但是他每天仍然要往学校的废墟上跑好多次。我的电脑里有许多张谭校长的照片，都是从背后拍摄的。一个中年人迈着苍老的步伐，经过堆积如山的碎片，向一所学校的残骸走去。

很多家长和老师像谭国强一样，踟蹰在灾难现场，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看似无望的搜寻。他们是灾民，也是志愿者，但后一种身份往往被忽略，直到5月16号9点40分，一个老太太在三块预制板下面摸到了一个活着的小女孩。

撤走的救援队伍重新在学校集结起来。我最后一次看到谭国强时，天快要黑了，沉寂许久的映秀小学的废墟上，再次挤满了人。他坐在人群中间，看到我，朝我笑了笑。其他学生的遗体，仍然静静地躺在他的身后。

尽管那年5月看过了许多悲欢离合，回想起这一幕仍然需要鼓起勇气。它太鲜活，就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对国家而言，这种创痛能否转化成有益的经验，并且对后来的灾难应对——比如刚刚发生在青海的地震——有所帮助，才是至关重要的。

在地震发生之初，如果充分发挥当地民众和志愿者的作用，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这是四川地震留下的经验中特别珍贵的一条。

在映秀小学和漩口中学里，很多得以幸存的孩子是被老师、家长甚至同学用手挖出来的。不幸被掩埋在建筑废墟下的人，掩埋深度和环境各有差异，多一双手，搬开一根梁木，刨掉一块石头，就有可能救出一条生命。世界上所有关于地震的报道，几乎都能够证实这一点，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地震发生之后，各国政府除了组织救援队之外，还会动员灾区附近的志愿者，尽一切可能前往灾区。

以志愿精神闻名于世的美国人这样阐述他们的理解：志愿者是自然灾害时的希望。发生洪灾、火灾、地震、龙卷风和飓风时，他们行动起来协助官员进行救援——筑栏建堤、提供紧急收容所与紧急救助、清除瓦砾，而后帮助重建工作。

随着交通恢复，很多志愿者立刻用各种方式赶往灾区，他们并不仅仅是政府组织的救援队的一个补充。应该说，在地震后的救援中，志愿者和救援队的作用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集中安置灾民，在安置点供应食物、水和药品，实施紧急的公共卫生干预，以及保证灾区的社会秩序，有计划地转移灾民和清理场地，必须依赖救援队。救援队有高度的组织性，随身携带有简易工具，还有后续的大型机械和医疗设备进行支援，可以在最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实施救援。但救援队的工作是围绕指挥部展开的，无论如何简化，都需要一个决策程序。在映秀镇工作的国家地震救援队、各地驰援的武警和军队，有各自的指挥部，然后通过一个联席会议分配救援任务。整个决策体系依赖每天早晚两次协调会。而志愿者是分散的，因此有一种不可取代的灵活性。

在灾难发生的早期，时间就是生命，需要分散决策。每一个及时赶到现场的人，用一切可能的办法——通常只能因陋就简——把其他人从废墟中挖出来，挽救了很多生命。这一切往往是在救援队和媒体大规模赶到之前发生的。

远离灾区的公众通过电视了解救援，通常看到的都是创造了生命奇迹的救援行动——这和媒体的兴趣有关——高度复杂、极其困难，对设备和技能有很高要求，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他们误以为这是救援的常态和全部。

人们忘了，常态和奇迹是矛盾的。大多数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幸存者都掩埋较浅，受伤不重，救援的时机——几个小时以内甚至更短，而不是 72 个小时以内——是最重要的。组织大规模集中救援不可避免地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受灾民众就地组织志愿者，或者附近的志愿者就近进入灾区，就能够进行有效的救援。

救援队抵达之后，滞留在灾区的人们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搜寻幸存者，为救援队提供信息。没有这些信息，很多奇迹就不会发生。

救援队的搜救活动必须围绕驻地展开。为了了解驻地以外地区的情况，会派出若干搜寻小组，但受到人手、通讯、陌生的地形和语言的限制，搜寻半径仍然很有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映秀镇的人们都不知道山里的情



况，直到有一些幸存者从那里步行出来，带出只言片语的消息。这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通讯中断、基层行政组织瘫痪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当地志愿者的帮助，救援队派出的搜救人员一旦离开城镇，几乎寸步难行。因此，志愿者在救援队的搜寻半径之外带回信息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救援队必须集体行动，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到尽可能多的现场，进行有针对性的帮助。因此，受灾面积越大，人口密度越低的地区，由于受害者分散，特别需要志愿者。

一家 NGO 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抵达青川县的回族自治县时，来自甘肃的志愿者已经通过当地的清真寺，调查并编

制了简明扼要的清单，上面大致列明了每户的人口和财产的状况。这大大提高了救援的效率，也让外界的帮助更有针对性。

地震初期常听到对志愿者的质疑，比如他们没有专业技能和大型设备，缺乏组织和计划，小规模、自发组织的救援活动可能造成重复和浪费。还有一个最常见的说法是他们占用了道路资源，因此阻碍了救援队的推进速度。

四川地震灾区大多是山区，地形复杂，进出灾区的道路因山体滑坡而壅塞，临时修通的道路上因此有大批救援车辆拥堵，很多志愿者驾驶私家车前去援助，的确加剧了堵塞状况。但是在开通了志愿者 QQ 群、用车登记热线和专门的网站后，这种情况很快消失了。

灾难造成的损失广泛而巨大，但在灾难初期，不可能对受灾的范围做出有效的评估。一旦志愿者能够深入交通干线之外的地区，他们除了可以提供紧急救援，还可以把信息带回来，为救援决策提供支持。

四川地震期间，“牛博网”的志愿者从北京赶到灾区后，一开始是根据媒体报道，自己开车运送物资。他们的初衷是面对面地为那些政府无力照料的灾民提供帮助，但很快遭遇难题：无法把物资直接送到需要的人手上，甚至连灾民需要什么也不知道。车队能够抵达的公路周边并不缺乏物资。他们常常发现，当物资运抵媒体提及的灾区，政府救助也已到达，最困难的情形已经缓解。有一次，车队即将抵达灾情严重的汉旺镇时，又遭遇交通管制，车队无法进入。他们后来改变了策略，尝试沿着陌生的乡间土路，深入远离交通要道的地区。最后，他们抵达一处人员伤亡不多但房屋损毁严重的村落。由于大量人力正在各地的废墟中抢救生命，在震灾最初几天里，许多这样的村庄缺少食品、水和住处，却得不到充足的援助。他们的到来对那里的灾民度过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是至关重要的。

对散落在各种偏僻地区的村落来说，任何来自外界的帮助都是稀缺而宝贵的，无论援助来自政府、军队、民间团体还是个人。志愿者组织的分散的、小规模救援活动，成本看上去比较高。但要让尽可能多的灾民得到及时帮助，分散的救援即便相对昂贵，也是必须的。

志愿者还能够搜集和保留有关地震的第一手记录。这些记录无比宝贵，它们能够抚慰幸存者，促使我们检讨灾难发生之前的行为，为历史积累素材，把经验和教训留给未来。

把救援队和志愿者切割开，甚至把他们对立起来，要求志愿者给专业人士让路的想法不仅荒谬，而且有害。如果珍惜四川地震留下的经验，中国就不光是需要更多和更大型的直升飞机，也应该了解动员、组织、训练和鼓励志愿者的重要性。

新校园和新家园都会有的，唯独生命一旦逝去，就不可挽回。灾难救援的经验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没什么比尊重和珍惜这些经验更“以人为本”的事情了。

图 1 为谭国强的背影；图 2 为玉树藏族救援队

## ESSAY 随笔

### “萝莉控”的非常美与非常罪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mailto:postdadaist@gmail.com)）

据日本《朝日新闻》3月16日报道，东京都政府拟修改旨在使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地方性法规《青少年健全育成条例》，将把对那些见于漫画、动漫和电玩中的、被认为未满18岁的虚构人物的“反社会性”性描写纳入规制范畴。对于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性犯罪行为，日本刑法中有所谓“猥亵物颁布罪”，用以规制那些在文艺作品中近乎实写的“精密的性描写”；《儿童买春·儿童色情禁止法》则以对实在的未成年人进行性描写的作品为规制对象。对作为漫画等作品中的登场人物的“非实在青少年”实行法律规制，乃破天荒之举。一石激起千层浪，该动议在教育界和新闻出版界掀起轩然大波，赞否两论，截然对立。

赞成、支持者多集中在教育界。此番修正案的“始作俑者”东京都青少年问题协议会认为：“容忍那些对极端令人厌恶的性虐待做写实描写的动漫、电玩等问题作品的流通，将会助长以儿童为性对象的风潮”；一名经常为女中学生的性烦恼问题做咨询的妇产科医生说：“持反对论者应该去看一看深夜的六本木，女子初高中生成群地踪着成年男子的实态”；著名华裔作家、歌手、教育学博士陈美龄则议论道：“实际上最弱的是孩子们。那些操着画笔的人，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孩子们任其宰割，可能被描绘成任何模样。那些玩弄、回避现行条例，对孩子们造成威胁的笔所构成的暴力及其所制造的榨取的现实，远远超出了世人的想象。”



『東京都青少年健全育成条例の改正案』に反対する作家等リスト

2010. 3. 15

【作家リスト】

- |          |         |       |
|----------|---------|-------|
| 藤子不二雄A   | 国友やすゆき  | 山本賢治  |
| さいとう たかを | 西岸良平    | さめだ小判 |
| やまさき十三   | はやせ 淳   | 上江州誠  |
| 北見けんいち   | 高口里純    | 森田 繁  |
| あだち充     | 私屋カヲル   | 金子ひらく |
| 高橋留美子    | わたなべまさこ | 名和宗則  |
| 青山剛昌     |         |       |
| 秋尾望都     | 板垣恵介    |       |
| 赤石路代     | 浜岡賢次    |       |
| 秋里和国     | 安彦良和    |       |
|          | 山口貴由    |       |
| 本宮ひろ志    | 田畑由秋    |       |
| 萩野 真     | 高橋兼介    |       |
| ビッグ 錠    | 吉富昭仁    |       |
|          | 余刚裕輝    |       |
| 大見武士     | 今川泰宏    |       |
| 中村卯月     | 戸田泰成    |       |
| やまだこうすけ  | 佐藤健悦    |       |
| 佐野タカシ    | 吉野弘幸    |       |
|          | 糸杉証宏    |       |
| ちばてつや    |         |       |
| 弘兼憲史     |         |       |
| かわぐちかいじ  |         |       |
| 小林まこと    |         |       |
| 前川たけし    |         |       |
| 八神ひろき    |         |       |
| 赤松 健     |         |       |
| 藤沢とおる    |         |       |
| 山本航暉     |         |       |
| 天崎范爾     |         |       |
| 岸沢直樹     |         |       |
| こしばてつや   |         |       |
| 西川宇宙     |         |       |
| 大和和紀     |         |       |
| 深見じゅん    |         |       |
| 中村真理子    |         |       |
| 秋元奈美     |         |       |

<順不同>

【コミック 10 社】

- |       |      |     |     |      |
|-------|------|-----|-----|------|
| 秋田書店  | 角川書店 | 講談社 | 集英社 | 小学館  |
| 少年画報社 | 新潮社  | 白泉社 | 双葉社 | リイド社 |

反对者自然是作为被规制对象的新闻出版界人士及相关的学界人士。从事传媒研究的立教大学教授服部孝章认为：“如果连虚构的人物都要被规制的话，那么与写实不同，规制之网有扩大至所有表现方法的危险，理应慎重。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是规制对象，有无因误操作而错加限制的可能，如何界定划线恐怕是一个难题。包括如何确保规制的公平性和透明性，有进一步议论的必要。”就“人物”年龄的判断标准问题，都政府方面解释说，“作品中明确发言 18 岁以上者，将作为规制对象外。”对此，日本书籍出版协会表态说：“登场人物比设定的年龄看上去更小，或年龄不详的情况很多”，因此，“运用现行条例已经足够”。更有民主党议员质疑说：“以行政手段来规制性表现的过激，对艺术振兴影响甚大。”京都精华大学漫画学部长、女作家竹宫惠子则认为：“一旦禁止，很多孩子反而会起劲地阅读。而且，更恐怖的是，18 岁以前处于无菌状态下，对粗砺的社会现实毫无知觉，然后突然置身于污泥浊水之中……哪怕通过虚构的形式，预先感知是非常重要的。”

毋庸讳言，都政府之所以试图以法律规制的形式强化管理，自然有其现实背景。在中学生、高中生很容易在普通的书店或便利店买到的漫画书中，有大量对“同龄人”与自己的血亲或老师间的性行为，甚至强奸的描写。这被认为是近年来，与未成年人的性有关的棘手犯罪不断增加一个原因。有鉴于此，2004 年，都政府把相关图书刊物指定为“不健全图书”，这类书刊在贩卖时被要求塑模封装并单独摆放，目的是使青少年无法随手翻阅，因而减少其入手的机会。此番动议实际上是把所谓“不健全图书”的指定范围扩大至虚构人物的检讨。可以想象，如该项法规被通过的话，一个直接后果是相关内容产品的出版业者码洋将锐减。

因文化原因，日本人对性的态度历来比较宽容，城市生活中充斥着大量关于性的信息和暗示。忘了哪位西方文化学者说过，日本是一个“潮湿

的非罪的性的天堂”。如果说在文学作品中，碍于法律规制，对性描写还需要做某种技术处理的话，那么漫画和动漫中的性，几乎是不加节制的、“赤裸裸”的、直截了当的。童颜巨乳的东洋少女被高度抽象化、符号化，已然成了举世公认的日本独特的文化标签。“卡哇伊”、“萝莉控”及各种被虚拟化了的所谓“非实在青少年”，不仅是源自东京秋叶原的 COSPLAY 的青春偶像，而且已成了发达富裕社会年轻人皮肤感觉的一部分，更是日本以“次文化”的形式向世界输出的“东洋价值观”，事实上是不可忽视的国家软实力。应该说，其背后既有规模庞大的文化产业的支撑，也代表了一种时尚生活方式，无言却有力地国际传递着某种信号，不间断地诠释、强调着战后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存在价值。

基于上述理由，倒洗澡水时会不会连浴盆里的婴儿一块泼掉，成了某些从事艺术、文化、出版的人士最大的担忧。“小纯

纯”萝莉塔有时候看上去有些坏，甚至有些“罪”，但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特别在“萝莉控”的眼中，却意味着“非常美”。或者说，唯其“非常罪”，才“非常美”——这真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文化两难、战略两难、逻辑两难和欲望两难。

图1为典型萝莉造型；图2为日本漫画家与出版社的联署抗议书

## ESSAY 随笔

### 如此动人的细节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peessoa1935@163.com](mailto:peessoa1935@163.com)）

读《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24日的《分家在一九七八》，颇觉有趣。作者杨勇军详细描述了七十年代末上海古籍成立的经过——从中华书局的上海编辑所、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古籍编辑室独立出来，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这篇文章从上古的第一任社长李俊民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宋原放自北京领命归来在上海火车站分手开始写起，第二段有云：

“挎包一点儿也不重，里面只有几份文件和换洗的衣服。可是李俊民紧紧抓包的姿势，竟然引起了车站几个小偷的注意，他们偷偷尾随其后，但是不久，他们都绝望地停止了脚步，因为包被抓得太紧了，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李俊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对他来说，里面的文件比什么都宝贵。”

这是大事件中的小细节，足以以为文章增辉。但稍一留意，文章第一句却是：

“1977年12月30日，上海火车站一列到站的京沪列车上，下来两个人。”

就是说，本文作者不大可能是秘书之类的随行者；除了李俊民，另一位已经告别了，小偷尾随、到绝望地未得手而当事人李俊民“浑然不觉”，那么，对“发生的”这一切，作者是如何知道的呢？三十三年前的上海街头，应该没有天眼吧？

这个值得怀疑的细节，让人连带对后面上古开会的场景也要怀疑起来：

“编辑们散去后的办公室虽然不在烟雾弥漫，可是开着的窗户又传进来鞭炮响过之后的火药味道。”

哪怕作者即是“编辑们”之一，既已散去，则只能去闻大街上的火药味道了。

读报时正好在看葛兆光先生的随笔集《无风周行》（上海书店2007年7月版），其中有一篇《钜鹿心事凭谁知？》，说的是历史上那位为赵盾的人格魅力所感动而撞树自尽的杀手钜鹿，这位杀手都死了，他那番剧烈的心理活动太史公是如何得知的？对此，葛先生的解释是：文学想像常常融入历史，有时候它还充当并建构着真实的历史，你不必把历史学家的记载当金科玉律，他们也有感情好恶，也有固执偏见，更不消说在那个文史还没有分家的左丘明和司马迁的时代，历史真实和文学想像常常可以在一部书中和平共处（P96-97）。《分家在一九七八》的“文学想像”细节自然不能怪到左、马头上去，要为历史事件增添动人的细节其实并不困难，火车站的两位乘客，李俊民和宋原放你可以去寻访（包括他们的家人、朋友），参与会议的编辑亦然。这些人讲的细节哪怕没有“绝望的小偷”出彩，但好歹真实。这样想当然的报告文学描述对于今天做“出版史”研究而言，未免太老套。如果只凭借一些材料，而不去寻访当事人，细节难免就只好拜托给文学笔法了。最近读小说家林斤澜回忆汪曾祺的《纪终年》一文（载《流火流年》一书），其中有谓：

“有时候，曾祺沏一杯绿茶，坐在已画未画纸团纸卷中间沙发上，好像那张沙发倒是后来挤进去来的；点烟，直眼，烟灰寸长自落。伸手在看不见的地方，摸稿纸，竟也能摸到钢笔。以后一气呵成，出来一篇小说。小说也越写越短。”（P25）

此说如果出自汪曾祺家人之口，还颇可信。出自另一位小说家之口，就只能说是“苦心经营的随便”了。

## INTERVIEW 访谈

### 朱天心&唐诺专访

特约撰稿人 灵子（北京，[liufang0815@gmail.com](mailto:liufang0815@gmail.com)）

晚饭时，朱天心指指手中吃掉一半的甜品，轻唤一声：“谢材俊，杨枝甘露。”对方摆摆手：“我不用，还没到吃甜食的时候。”



间，抱歉抱歉。”

小小的场景几近典型地展现出夫妇两人的特点与习惯。漫于纸面的豪情之外，现实是一襟柔情映照。

“小说书写者”朱天心——他们惯常拣选这个字眼，恐称“小说家”太过狂妄——生活里永远这般语气温婉，低眉慈目。52岁的她看起来仍像中学生，有时带着与其在台湾文学界的声名不相符的怯生生，让人难以想象她作品里面的执拗和火气究竟何来。

“专业读者”唐诺（原名谢材俊，笔名源自美国“梅森探案系列”

小说男主角“赖唐诺”）则总习惯以“抱歉”作为一段话的句点。在近期京沪四场讲座里，常有读者向他提出“伪”问题，他细细剖析开来，告诉你为什么问题为伪，为什么事情不是非 A 即 B 那么简单。然后，“我很清楚我并没有解决你的困惑。抱歉抱歉。”

他们在上海的第一场讲座定于 4 月 21 日，赶上全国哀悼日。读者们从早到晚打了无数电话来，担心讲座会因当天娱乐文化活动全被叫停而取消——毕竟，歌手光良仅仅是在这天给爱犬洗了个澡，就遭到爱国又暴怒的网友声讨——唐诺宽慰大家道：“放心，我们举行的是哀伤的文化活动。”

说哀伤，倒也不全是玩笑。次日复旦的讲座中，唐诺提及他日复一日写作的咖啡馆里，总有一个妈妈在批评孩子学习为什么那么差，总有一群骗子在讨论股票和楼市，但再也听不到人们讨论文学。“你越来越清楚，文学早已不再是人生的基本事实。”

“今天在台湾，如果你谈文学，很难超过 25 个人到现场，即使来的是非常好的文学作者。但是只要挂一个头衔，比如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某公司的副总来谈投资理财，一定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话到这里，唐诺一笑，“可我不是在哀号，我只是陈述事实。”

在大部分人那里，文学和生活已毫不相干。但对唐诺朱天心而言，很难分出二者的界限。

他们身边全是书写者：朱天心的父亲朱西宁是军中作家，1949 年随国民党军队来台；母亲刘慕沙是台湾著名日语文学翻译家；姐姐朱天文是著名小说家，电影导演侯孝贤



的御用编剧；妹妹朱天衣亦曾写作。朱天心自己十六岁便在报纸上连载小说《长干行》，十八岁创作长篇自传《击壤歌——北一女三年记》，至今重版十多次。

“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他们的老友、作家阿城曾为朱天心的作品《古都》作序说。

唐诺天心是高中时期认识的。彼时唐诺编校刊，常去约作家朱西宁的稿子，慢慢与同龄的天心熟识。十年后，应读者的强烈要求，两人结了婚。

“人们总在想象我跟这么一个十几岁就名满天下的人——那时候所谓天下就是指台湾——结婚该怎么办，觉得我一定是在酗酒，然后回家捶桌子：‘我都没有自我！’”唐诺笑笑，“你们真的想太多了。”

日常生活里，他们每周七天无休，在同一家或者分别两家咖啡馆里写作，从上午九、十点钟到下午两点。这些年里，单他们眼睁睁看着死亡的咖啡馆便达五家之多。

唐诺总是天心作品的第一读者，二十多年来，他负责誊写天心的作品手稿。他又向来要求严厉，偶尔评论天心作品时，好友、小说家骆以军都会忍不住出来打圆场：“没到那样啦。”

“我们很少谈小说真正处理的题材，我不会进入她的工作坊。不是因为朱天心不相信我，而是我担心她有时候会相信我，那会弄乱掉。我希望她保持自己的思维，书写永远是孤独的。”

与姐姐天文的迥异书写，某种程度上可以给这份孤独做个注脚。她们从小到大从未分离超过一个月，成长于同样的环境，认识同样的朋友，甚至读的书都是差不多的。两人文学风格却截然相反。朱天文淡泊超然，仿佛世界喧嚣都无法进入自己的沁凉世界。朱天心用阿城的评价则是：“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这造成她一种强悍的敏感。敏感并非是阴柔的，所以朱天心的强悍类似玉石。”

从八十年代《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开始，朱天心由青春小说转向对弱势族群的深切关注，此后一直关切公众事务，因为“政府的好坏是一时的，建设公民社会才是长久的。”

## 朱天心专访——纯文学的恐龙在这里

我关注的东西越多，可以写的越少

问：你会参加社民党，参与倒扁活动，关注现实议题，这种与现实很紧密的状态会不会与写作需要的状态冲突？



朱天心：在早期我比较感觉不到，甚至觉得这是互为表里的。你看到现实问题严峻，很想做点实际的行动。但写作是一个很缓慢的事情，有它自己的时间表，有时候需要二三十年的沉淀。真是急死人了。所以你会找寻一些写作之外的社会实践，不管最后结果是否尽如人意，多少你有做事。这也是为了保护我的写作，我好怕我心急之下会把自己唯一会的事情变成工具，比如明天要游行了，我今天赶快写一个工运小说……

可是最近参与社会事务有了新的感受。以前我会觉得要向强者——不管是社会主流，还是拥有权力的人——说不，是很困难的事，需要很多勇气、对策。这三五年，我觉得向弱者说不是更难的事情。但只有你两者都能做到，在文学上才有全然的自由。

这种触动来自我的实践体会，也有我看到的文学经验。比如陈映真，很左翼的作家，像大陆三十年代的作家。他对笔下人物充满同情，他们已经这么弱势了，会忍不住把他们都……

问：美化？

朱天心：甚至神化。也许你把这看做社会工作，替他们发声，可是在文学上，任何神化都会伤害到你的文学性。我在社会实践中会感觉到，有些弱者，可怜之处必有可恨之处，你要完全地写出一个生动的人的时候，无法只选择他可怜的或者好的部分写，必然也会写出他人性里的缺点，甚至卑劣之处。可是又怎么忍心呢？你要替他说话都来不及，怎么会在说话的同时又捅他一刀？所以这三五年我给自己一个功课，要学会向弱者说不。

去年我们有个陈映真创作 50 周年研讨会，大家都在歌颂，只有我一个人的题目是“逃离陈映真”，别人都很错愕。作为一个文学书写的作者，我对他的敬仰就不必说了，但是站在文学本位的话，我会觉得要是陈映真有一天也敢对他的弱者说不，他的文学成就一定会更高。当然我这个说法得不到响应，大家说陈映真哪里是要文学成就，他是不得已。他是想做列宁、想做毛泽东不成，所以只好写小说，他才没有对自己的小说这么在意。可我自己还是把文学放在最高位，其他次之，我的价值序列是这个样子。

问：这三五年里发生了什么让你有如此感触？

朱天心：我的好多朋友在台湾做的都是边缘又边缘、弱势又弱势的社会实践。比如台湾有大量外籍劳工。他们在法律、社会福利方面都很欠缺。因为他们不是台湾籍，没有选票。台湾是很现实的社会，虽然知道他们的处境，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愿意帮他们说任何话，他没有投票权嘛。外籍配偶的状况也是一塌糊涂。我看着他们已经做到底了，能动用的所有资源都动用了，自己也很急迫想出一份力。我可能是里头少数能写的人，也想帮他们写，因为这是我唯一会做的，你去帮忙游行也就是多一个人头，媒体能登都还罢了，大部分都不登。你的力量是你的笔，不是多一个人。但是一下笔，你又发现没法继续。我接触的人越多，会使得我可以写的东西越少。我在文学上已经快要到一个致命的危机，可以写的变得好少好少啊。

问：那还会那么投身这些政治议题吗？会不会因此要站远一点？

朱天心：我很羡慕那种方式，可以一了百了。但我知道自己心很热，无法真正隔离。我现在其实光是做动物保护就已经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对于外籍劳工之类的活动只能做到互相声援支持，有重要的事情要开记者会，或者要上街头的时候，我们站在一起。

现在这个结越打越死，好像你在小说里面越不能帮忙什么，就只好在实践里头多做一点什么帮助他们。可是做得越多，能写的越少，这个结我也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

素朴的爱国是蛮可爱的，可是这样子好吗？

问：你曾经提到“现实跑得比你设想的还快，眼前的荒谬比你想的还要恶意，很难处理这层时间的差距。”

朱天心：我一直有一个还没开始的长篇题材，想用列传的形式把台湾的一代人写出来。我心里有二三十个名单，绝大部分是政治领域，比如陈水扁。这么多人崇拜他，没道理，你本来很想把他们从神坛上拉下来，想写原来他们过往是怎样的人。可是你还没准备开笔，他已经是全国的过街老鼠，不用你讲，有人比你还讨厌，比你还恨。你的动力本来是告诉人家他不是那么好，但现在好像倒过来你在说他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堪……这个荒谬感就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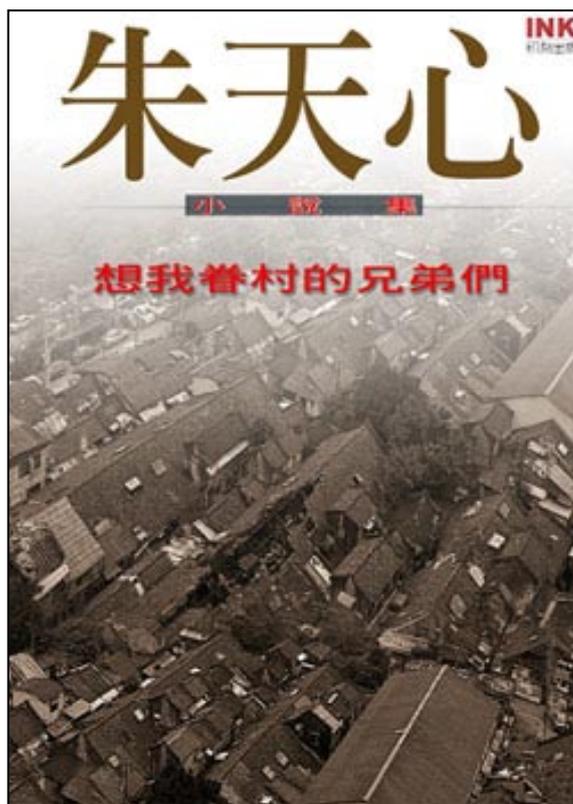
台湾这么更迭的政治状况，还不待你把真相还原出来，他们自己都已经说明了。我曾经很敬重的一位民进党人士张俊宏，在牢里写东西的人，他今年初在台湾一个县选立法委，只有两千票，都是亲友票。人家都已经自动弃绝他了。那又何需你去讲他？这些都是我面临准备了这么久的大题材的一个困境。

后来唐诺有提醒我说，你要描写一个时代面貌，也可以不要这么政治。倒不是说安全之类的考虑，而是这些政治人太经不起了，他们本身可能就没有多了不起的思想和学问做支持，是纸片一样的人，寄托不了很多。不如把这些人物改成你更熟悉的文化界的人，很多人在台湾、在大陆两岸都在神坛上，你不觉得把他们掀下来更有趣吗？尽管开一个大车要转向不是那么容易，可是这个提醒确实对我有帮助。

问：你为什么选政治人物作为反映时代面貌的切入点？

朱天心：我们这些 1949 年跟父亲到台湾“外省人”，从小受的是忠党爱国的教育，可是到了二三十岁，碰到大的政治变动，当场变成一场笑话，甚至是污点。在前十年，李登辉后期和陈水扁刚开始主政的时候，像我们这种外省人，会时时被问到说：万一有一天两岸打仗，你会选哪一边？他不用等你回答，就认为你一定会倒向对方，一定会通敌的。你的忠诚度会因为你父母的出生地而被彻底质疑，所以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意理解和关心政治的问题，它会来理你的。它伸手向你的时候，你会有你的困惑、不平、愤怒，所以很难免想要把政治当成一个重心。

另外，很多人对我而言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年轻时长期有一个困惑，为什么我们从没有占过任何的身份的便宜，却被本省人那么痛恨？而且当时还打着民主的旗号，民主怎么会是这样激烈残暴的方式，民主不是应该更宽容、更多元吗，怎么会是“外省人滚回去”这样的排他？为了解决这个困惑，我找了很多党外杂志、禁书去看。看的时候知道，原来台湾人也有很多伤心事，他们的生命史、家族史充满各种各样的苦痛，以前被日本人、后来被外省人压制和剥夺。好比规定说国语的时候，很多说了一辈子台语或者日语的人就像失语一样，六七十岁的人也没办法重新学国语，开电视也看不懂，听广播也听不懂，他对国民党怎么会感激呢？痛恨大概是最正常的。虽然我不一定能接受，但我可以理解他们了。在大量阅读的时候，我补修了很多台湾学分。那个时代勇敢地写这些文章的人，对我都有这样解惑的意义在。



问：你小时候在眷村的经历，对当时被误解的愤怒，是不是最初的写作动力之一？

朱天心：当初也许没这么自觉，可是现在看回去，确实如此。

外省人有很多种，眷村基本是外省人的底层，是国民党中下级军官才会有的。国民党一再在喊反攻大陆，直到韩战起来，国际格局变化，知道肯定回不去了。这时候要为这 200 万大军找个容身之处，才盖了大量眷村。眷村在城市的市郊边缘，是台湾人都不要住的地方、不要种的田，非常孤立，而且可能在这里住一辈子。你要是运气好认识本省的朋友，或者运气更好结婚的对象是本省人，可以知道本省人的生活和想法。可是很多人一辈子生活在眷村，社会的变动他永远没法了解，一直活在假想的中国大陆里头。

这些人生活状况很悲惨。比如最初是不准许军队的人在当地结婚的，因为随时准备回去，结婚就会有牵扯。韩战之后允许结婚，老兵们年纪都大了，那一点点微薄的薪水只能娶到穷人、残疾或者山里的原住民、东南亚新娘。穷人跟穷人结合的结果通常是永世不得翻身，甚至小孩都有可能是残障的。你可能看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外省老兵样子，在眷村含饴弄孙，好有福的样子，其实才是带他的儿子。

可是这些人在台湾剧烈变动的时候被卷入，被看做是国民党的帮凶，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被认定是国民党的铁票，每年不管任何选举国民党推再烂的人出来，在台湾社会的理解里，眷村一定会选你的票，你的票箱就不用开了，一村三百人，打开之后三百票肯定都是国民党的。但我看到的情形不是这样子，他们这么悲惨，哪里获得利益？我会为他们不平，我觉得自己还有笔，被误解还有说话的余地，可他们就没办法，所以我会写《想我眷村的兄弟》。

问：这时开始你的风格变了。此前还是青春欢笑的题材的，比如《击壤歌》，现在拿出来再版，大家重新看到当时高中女生对国民党领袖的崇拜，会觉得政治不正确吗？

朱天心：去年我在香港书展，马家辉直接点名问，你怎么看待你过往对国家民族的这种用感情的方式？我丝毫不回避这

个问题，也不觉得这是个可耻的过去。“外省人第二代”是跟着父辈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你的命运与他绑在一起。你们想象的敌人、对历史的记忆、使用的语言都是相仿的，将来能不能回大陆去也是看蒋介石，很自然对他是对待亲人、父兄一样。这对民主来讲当然是很不健康的一个状态，你怎么能对一个权力拥有者用感情呢？你用感情和信赖不是等于交一张空白支票给他吗？予取予求，随便任他打任他关？可是这确实是在历史情境下曾经真实的一个阶段。

所以到后来会很感慨，在李登辉后期和陈水扁的时候，你会看到，唉，悲剧又重演了。你会看到大部分的台湾人会只因这两位跟他们说同样的方言，一样的历史记忆，一样的价值观，就觉得这是我们的人。以前说外省人跟蒋介石如何，毕竟是在一个没有人懂什么是民主的时代，现在已经进入大家都认为是民主的时代，结果你还是重蹈覆辙，你还是一样用信赖对待一个权力者。外省人眼睁睁看到悲剧发生又无能为力，因为他在这十年是失去话语权的状态，你要是说你们要想我们以前走过的路，对方就会说，哎，你们的人当统治者的时候就什么都对，换我们了你们就不高兴啊。或者，外省人已经爽了五十年，我们本省人爽个两年有什么关系？你对民主的这番体会和启蒙变得没意义。《击壤歌》也许这时是一个负面教材，固然素朴的爱国是蛮可爱的，可是这样子好吗？

**现在眷村像是被打死的蟑螂，可以做做标本了**

问：外省人失语的状态，在文学领域也是如此？

朱天心：文学界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有研究生念城市大学——成大一直本土色彩很强，第一个有台文所——硕士论文本来要研究我，但是指导教师直接告诉她：“这种外省作家你去研究她干什么啦？研究了也不会过。”所以在那十年，很多中文系里，任何教授退休或者有意外情况有空缺，都是宁缺不补的，但是台文系，只要申请就能开设。现在这部分在马英九上台之后很自然地衰败了。不是说马英九的作为怎么样，他不会在省籍问题上以暴制暴，而是说陈水扁的神话结束，大家也甘心了。外省人也做过，本省人也做过，就是这样子啊，有一点都扯平了，好像大家又回到起跑点，比较心平气和。在现实中，本来台文所本来就没那么多东西可研究，所以很自然悄悄转了方向。

问：外省人的地位变化会对文学创作产生什么影响？

朱天心：我觉得这二三十年来，成绩比较好的是外省作家。理由一点都不奇怪，以省籍看，本省人如此政治正确，处在一个这么舒服的位置，作为个人可能很幸福，可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没有任何动能了。外省人的处境比较艰难，讲的话因为不容易被人听到，就更得琢磨，要不就把声音放得很大，要不就把技巧变得高超，本事被迫锻炼得比较好。

我比较推崇的，现在还在写的作家里面，天文，内举不避亲，骆以军、张大春，这几个都是外省作家。舞鹤是本省人，何以东西这么好，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从来不占身份的便宜。他出身政治正确得不得了，是台湾最有历史的台南在地人，但他从来不用这些，在有机会发言声援的时候，是完全跨越省籍的。可能也是这个关系吧，他的作品可以跨过刚才说的宿命。

问：对于眷村的历史，你觉得在文学表现上有很好的把这段描摹出来吗？影视方面，近期如电视剧《光阴的故事》，话剧《宝岛一村》，在两岸都火得很。

朱天心：眷村题材曾经很贫瘠，这有它的历史背景。眷村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台湾人或者民进党妖魔化，以至于很多人会装作自己不是外省人。家长会跟孩子讲，在学校老师问你是不是外省人千万不要说。我觉得当外省人自己都不跟子女讲家族故事的时候，这个族裔已经形同为绝种。

陈水扁下台，大家又重新回到起跑点的时候，眷村影响没那么大了。这时好像蟑螂苍蝇已经被打死，不会再有危害，那反而可以留下来研究一下，把它做做标本。我不晓得这个态度会不会太轻佻，但确实感觉如此。在表现方式上，永远是比较次文化的东西容易传播，所以影视很快出来。有些严肃的眷村人对这个比较反感，觉得他们太消费了，太强调眷村有趣的那一面，好像这十年里艰难的、被羞辱的、严肃那一面都不存在。可我自己觉得还好，原来是一个荒漠，总要先有各种生机出现，最后了不起的东西才会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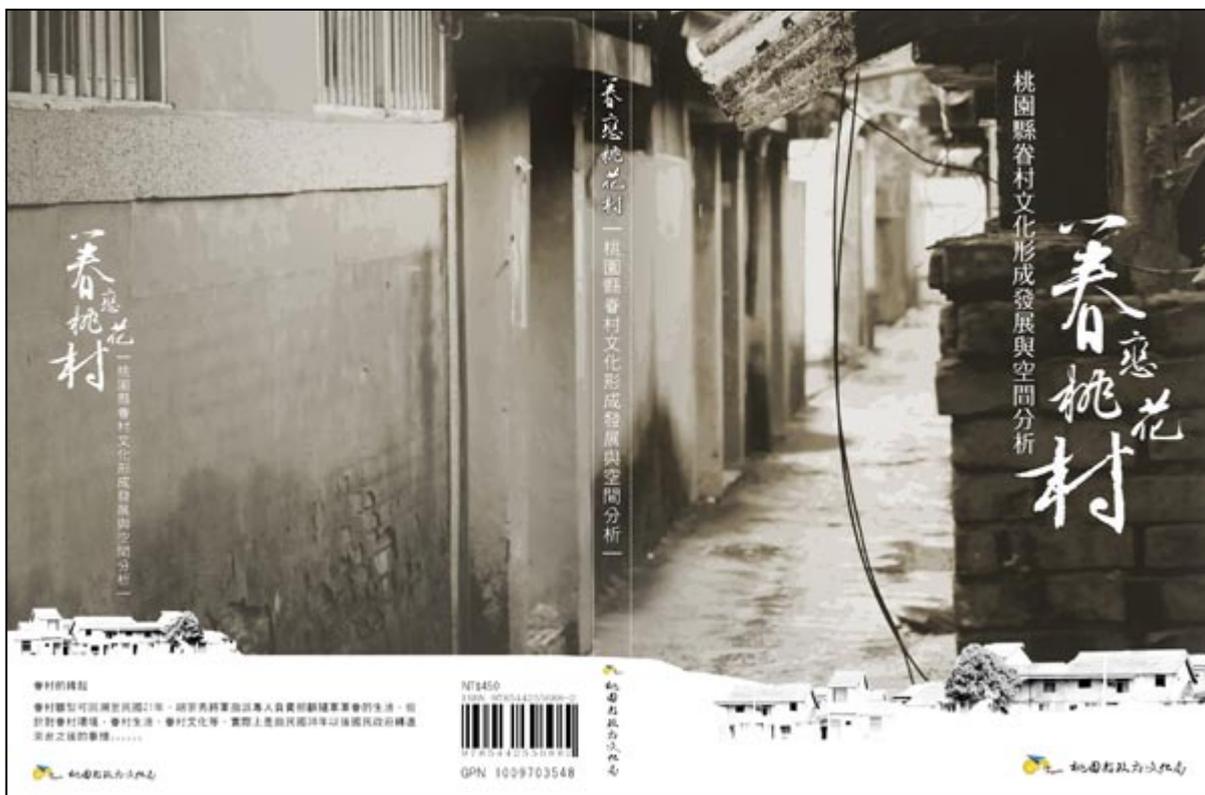
问：张大春的《聆听父亲》，也是追溯外省人的个人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台湾是否会有文学意义以外的反响？

朱天心：这倒没有。唐诺说我和大春对于外省的记忆是采取不同的政策。大春是索性颠覆它，讥笑它，甚至是，我干它。台湾在在地人打造国族历史或神话时，大春的策略是玉石俱焚，要拆穿你，我先自我拆穿。唐诺认为我是，“我记得，我看到，我记下。”当然我这样会惹来非议，因为讨厌嘛，大家都在欢呼，台湾民主化了，多元包容了，你每次都出来扮演乌鸦呱呱呱，很扫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在台湾社会或是文学领域就是扮演这个嚷着皇帝没穿新衣的小孩，老是要拆穿别人好事。大春的策略不是这样，所以不会变成这么清楚的标靶。

问：你的选择真的要自己足够坚定才可以。

朱天心：不然会觉得好像会退无失所。像我家那些猫一样，三脚的、两脚的、身体病歪歪的，你都不要它们谁还会要它们？我会觉得，我不说就不会有人说，所以我只好说。

求仁得仁吧，你要选择另外一条路，做一个普通市民，也许会好过很多。但作为创作者，那样就把自己的爪牙拔掉了。这选择也没有高下之分，只是你要了这个，你就得承担你可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很不习惯去叫苦或者抱怨，因为是你自己选的，没有人去逼你，那有什么好抱怨的？抱怨自己吧。



飞到无何有之乡的风筝，与地上的人有什么关系？

问：作为小说书写者，你对自己的自我要求是怎样的？

朱天心：每个阶段大概不同。二三十岁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能把自己当成一面镜子，擦得亮亮的，一点都不折射，不是哈哈镜，不是凹凸镜，真实客观把现实反映出来，就是无限大一个功德了。

再到某个阶段，会觉得你不要装了，你毕竟不是一个镜子，你是一个生命，有感情有想法有个性，有自己对现实的关心。有的人可能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小空间里，但是我不行。现实对你不断干扰，你也不能不理它。所以我在四十左右，觉得就算自己是一个哈哈镜凹凸镜，那也称职地表现它吧。只是差别在于，你怎么样可以把你的执拗和偏见发声

出来,而且可以说服别人。

等到五十的年纪,我给自己的要求是,除了能说服别人,这个过程还应该是赏心悦目的,是好的文学作品,有好的艺术形式。不晓得到了六十七十之后,会不会我连装都不想装了,就想做个传教士。觉得生命有限,秒针在嗒嗒响,有很多想说的话,但是怕时间不多了。有些了不起的作家,比如托尔斯泰,前面的小说成就已经这样大,可是到最后——尽管他已经很长寿——还是觉得时间不多,赶快要把自己最后相信的东西说出来,不假装不虚构。我也不晓得自己有一天会不会这样。

问:你觉得纯文学要承担一定的功用吗?比如对现实问题的反映甚至改变。

朱天心:我从来不把所处的现实看成一个责任,不是说你有义务回应你的现实,而是它是优势和特权。我们的父祖辈也许好想知道到我的孙女那一辈在想什么,我们未来几代的人也许会奇怪台湾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整个岛感染了瘟疫或者热病,怎么会所有的人好像没有脑子的做同样一件事。我们真的好幸运,正好处在此时此刻。这应该是一个优势,你放着这个别人想破头想知道的此情此际不看,自己生造一个世界出来,我觉得好可惜。飞得再高的风筝不打一个钉在地上,不晓得有什么意义。幻想要与现实要有一个张力,不然它飞到无何有之乡去了,跟我们地上的人有什么关联呢?

当然我也可以了解其他作家的不同想法和要求。好比天文,她对现实的热度就跟我不同,她是习惯在旁边冷眼看的人,所以她比我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像我这样的心急之人,恨不得说的话可以对现实有一丁点的波动。其实就像台湾一句俚语“狗吠火车”,狗对着火车大叫,但火车还是轰轰烈烈驶过,这是非常徒劳的。可是我就永远不信因为你的写作不会有一点点的影响,这也是支撑我在写的一个动力。

问:抱有这样的期望,会不会很多时候都很失望呢?

朱天心:会。可是你会退守到最后。我每次爱举纳粹时期那个神甫的话做例子:“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这是我最后给自己的一个最底线,我最起码发声了。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是万一台湾真的走到万劫不复的时候,我最起码可以对自己交待。我不要有一丝丝懊悔,那时候要是我说了什么,可能现在不至于……

问:有没有人评论你像鲁迅?

朱天心:我好希望哦!因为我很喜欢他的很多小说,包括去年我在香港书展的讲座题目就用了他的“呐喊”。很多内地来的媒体觉得很诧异……我一直不晓得鲁迅在大陆是一个什么状况,台湾到现在还是只有文学系的人会读个一两篇,完全没有人谈。我自己是喜欢的,包括他的铁屋子的譬喻,现在对我还是一个时时的提醒,或是说明自己的很好的例子。王德威有一次写东西说我很像鲁迅,他讲的时候我第一反应说怎么能这么讲,其实偷偷好高兴。

这几年台湾好像做了一个梦

问:唐诺在讲座里说,“在这几年台湾好像做了一个梦。不知道你做的事情对谁有意义,好像没有人对你感兴趣。在这个意义上说,大陆对于我们来说变得非常重要,原来你做什么还是有人在乎的。”你认为是如此吗?

朱天心:是这样。我也不晓得这是不是全球的现象。本来大家觉得文学的主力读者,起码在台湾长期以来,是高中和大学生,他们刚进社会,阅读习惯还在。可现在这群人是不看东西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网络的关系,这代人更在意横向的讯息,同侪、朋友、社群之间关心的话题,你即使不感兴趣也要感兴趣,不然你就插不上嘴。比如大家都在网上讲陈冠希,你就得多少知道一点,不然无从理解你的同代。所以你后来一步一步变得都很相仿,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里想同样的事消费同样的东西。

他们好像觉得上代人跟我没关系。我们以前喜欢一个人的文学,不会在意这个作者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还是已经死了半世纪。可现在年轻一代很在意这个,我 22 岁,那 23 岁的作家都嫌老,要看就看 22 岁以下的人写的,之前的人没有必要去

了解。这好像一个核爆的场面，唰地一下方圆几百公里全部夷为同一种东西。我觉得台湾这个特质非常非常明显。

在大陆好像还不是这样。大陆现在很像三十年前的台湾，读者不是光看热闹，他会带着问题来。你会觉得你对人家是有意义的。几次比较之后，我们都觉得，台湾完蛋了，台湾过往某些走在前面的优势已经吃老本吃光了。

问：但大家总感到还是台湾的文化氛围比较好，大陆是让人失望的状况。



朱天心：台湾也许在生产创作那一面目前还 ok，可是读者这一侧萎缩很厉害。也会有人找你签名，可是那个签名旁边怎么会是林志玲或者蔡康永？那就很尴尬。

台湾有一个九歌出版社年度文学选，每年选一篇小说做年度奖。去年我的《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获了奖，有个公视记者访问我——公视是公立电视台，不用商业角逐，一般比其他商业电视台素质好很多——问的第一句话是：“像你这样一个新人，第一本书就得奖，你会不会很兴奋？有什么感受？”我当时连生气或者质问的心情都没有。天哪，我们公视跑艺文的记者是这样的素质，真的再次被震惊。

问：意识到这种状况，会对创作有什么影响吗？会因此觉得写作没有意义，或者因为这样，需要去关注年轻人关注的东西？

朱天心：你说的这几种情形都有作者去这么做。我自己是觉得，所以更得“在着”。纯文学这个族裔已经快要绝种了，如果有一天读者们说，那个恐龙快要绝种了，哪里还有一个让我们去看看？喏，恐龙在这里。

图 1 为朱天心和唐诺；图 2 为朱氏三姐妹年轻时；图 3 为朱天心

## 唐诺专访——只有文学无法躲闪

问：你曾经引用过一段话，小说家几乎一辈子都很难免于长期一事无成的失望之感。



唐诺：是，每一代人都这样讲，小说越来越没力量。但是，所有社会学科都做了自我的限定，不回答无边无际的问题，不去处理信仰、信念、情感、渴望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比如经济学，不处理价值，只处理价格，不处理道德，只保持中立。当大家都只管那一块。作为生命整体的一些疑问靠什么东西来回答？经济学到一个地步就把我们抛下，物理学到一个地步就把我们抛下……我始终觉得，只有文学没办法闪避，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回答。作家没法把复杂的生命用几个规则解释出来，告诉我们一套简单的策略和方法。

我接下来可能会写一篇文章，“不想写小说的小说家”。大江健三郎曾经说我不该写小说了，朱天心一段时间告诉我不要写小说了，这个心情究竟何来？大体上小说最擅长的位置和时间不是在事件发生的当下，用格雷厄姆·格林的掌故讲，小说家是收尸体的人。事情结束之后大家都离开了，小说书写者来重新审视灾难。小说最强大的力量也在这里。

可是当你对现实有个强烈的主张时，你会变得非常绝望。天心曾经最喜欢讲的寓言是卡珊德拉：阿波罗给了她预言的能

力，但又没有得到她的爱，便诅咒她：“虽然能正确的预言未来，但却没人会相信。”当作家有太现实的主张时，小说会被反挤掉。《盛世》某种程度也是这个样子。陈冠中可能有所不同的是，他是第一次用这个体例，不太得心应手。

所以对小说家我会有点怜悯，不是他们在小说领域不得力，而是他们想要拿小说去做很可能是超过小说能耐的东西。他们想用另一种身份和能力跟这个世界搏斗，可问题是你究竟有没有这个身份和能力？你可能牺牲了小说，另一部分也未必成功，你永远在夹缝之中。

问：不想写小说的小说家，最后大抵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唐诺：以我所看到的，最后都还是小说家，因为那毕竟是你真正唯一会做的事。当然说这个话的时候，通常都是深刻的体认，是到一定的年岁，才会这么真实。三十岁时还有各种可能，当你说不要做个小说家，可能想的是我可以写广告、拍电影。我说的这类，通常是看到小说的极限和尽头，但是不完满，就像生命永远不完满一样。

最彻底的就是托尔斯泰，他晚年写的东西基本连体例都改变，写那种我们今天看起来像公民道德一样的东西。晚年他单纯相信福音书，觉得这才是人类的拯救之道。善恶对他来讲已经变得太清晰太分明，小说的复杂性某种程度消失了，我们说好像献祭给上帝。但即使这样还是会写下去，所以大江后来还是继续写，朱天心那个话我也已经听了十年了。

但他们不是说假的。就像博尔赫斯晚年讲的：“我们都只读我们喜欢的读物——不过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写的，而是我们写得出来的东西。”你喜爱的东西每一样都超过你自己的能力——有些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作家这么重视自我。

台湾也存在年轻世代跟上个世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下一代觉得上一代压抑他们。天心有一次接受访问，年轻人问：你们上一代怎么看我们这一代？大概有一点哀怨的意思。天心的回答很好：其实如果你们下一代写得够好，我们这一代就轻松了。

她讲了个例子，那时候天文的《巫言》、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天心的《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都相继出版——有人认为是以上四人是台湾当代最好的四支笔——有一次舞鹤讲起这个，说今年很特别，你们三个都交出作品，天文就说所以你也很想赶快写？舞鹤说不是，因为你们都交了，我就可以慢一点。如果你们都不交，我连滚带爬都要交上。那个心情之明朗，对文学的纯净，完全是真实的，不像我们所知道的小说家互相较劲倾轧。我现在说这个话还会有点激动。所以天心说多希望你们能写上来，但凡多几支像骆以军这样的笔，我们就可以更从容面对书写的问题。

问：如果是你怎么回答下一代的这个问题？

唐诺：我觉得这问题很像问NBA的高个子，上面天气怎么样？我第一感觉是，你以为我们成了吗？台湾的小说虽然表现不坏，从它的历史条件、人口数量、书写的限制来讲，这代作家的表现已经让人无话可说，已经近乎半个奇迹了。可是我仍然要说，他们离开我认为的最好的小说——我说的不是诺贝尔奖，诺贝尔这几年已经烂得没办法看了，拜托，如果这样都可以拿诺贝尔，台湾大概有七八个人都有能力拿奖，就不用说高行健了——格林、纳博科夫、昆德拉、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当然名单可以商量。台湾距离他们还有半步或者一步之遥。现在觉得自己是完成品，这种姿态是很可笑的。你以为我们这一代已经成功了，所以要含笑入土，把剩下的交给你们？没有，我们还在路上而已。台湾未来五年之内，可能还要靠这个世代来支撑。这大概是可见的景观。

我对台湾下一代的书写非常悲观，这一路上都在讲。我每次都跟骆以军讲，完了，从你下去我真的看不到谁了。感觉上自己一再降低标准面对他们，可是还是找不到称职的书写者。

问：大陆的情形呢？

唐诺：大陆我不敢讲。我可能有一些以偏概全，不过文学从来都可以以偏概全。就像整个哥伦比亚对我是一个光亮的存在，其实我知道的就一个人，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学就是这样，那个人大于全体。

我对大陆有深刻的期待，尽管我不断听到有人说大陆现在非常糟糕。年轻人对老一辈成名作家口出恶言，要么就是说“没看过”，而且觉得一点都不惭愧，觉得这是合适的待遇，理直气壮。但是我几次来大陆，私底下静静观察，都觉得大陆的年轻世代比台湾好很多。

大陆的写作也许暂时撞到一面比台湾更严重的墙，呈现更宽的鸿沟，可能上一代的人在克服这个问题上更困难。但愿未来不是如此。未来当然不会是郭敬明这些人，但是总有一些优秀的人散落在各处，似乎蓄势待发。总有这样的可能，而且这个可能对我而言已经太好了。

问：你指的是什么问题？大陆作家在面对城市化的问题上的处理？他们好像有一种退的态度，处理不了城市，就退回到以前熟悉的经验。

唐诺：大陆这一代的撤退是因为大陆有众多的空间可以躲藏。比如莫言，城市写不成，可以回高密，那里还有不断的传说故事；王安忆有发展时间较慢较不挤压的水乡，暂时还可以歇脚，喘一口气。台湾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你到哪里去？

很好笑，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出来的时候，台湾几乎每一个重要的作家都有一篇直直接接的习作，最快的一篇叫做张大春《最后的先知》。当时大家要学习那种魔幻写实，要找寻那种最荒谬和最现代之间的碰撞，在台湾去哪里找？所以张大春写兰屿的原住民，台湾旁边一个很小的岛。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笑，辛苦你啦孩子，你还真的去找啊。但是对大陆作家来讲，还有山西的窑洞去钻，漠河可以去看，还有地方可退。

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觉得台湾书写对于大陆有一定的意义在。有的城市可以躲闪，这个问题可以不用处理，或者不被允许处理，自然从它书写里面隐去。但是台湾因为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再加上台湾的平坦，没有任何隔绝，发展不出独特的东西。列维·施特劳斯说过，只有隔绝才能发展出独特。台湾是整体过早地铺散在有全球化这个名词之前，就在一两百年来资本主义的游戏里头，像大轰炸一样，没有死角可以躲。台湾完全是破碎瓦解的被撕裂的世界，书写被逼得很惨，但也因此有交流对话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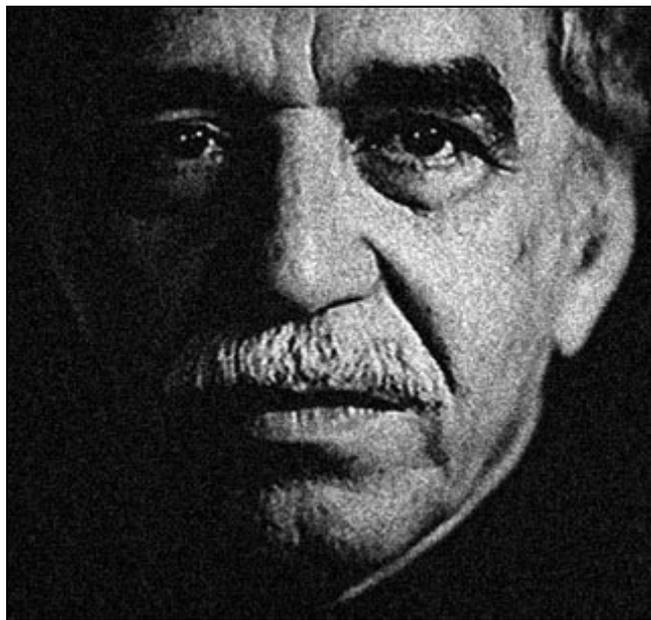
我一直想有机会把这部分经验找出来，可我不能代替他们说。我也不想大家误会成这是一个必然，好像要把这个世界描述成一个时间表——过去我们最痛恨这个发展理论，也理解大陆通常也不要听到这个话——就是当初欧洲人那种倨傲：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好像人类排队领圣餐一样，历史发展的时刻表好像是 ABCD 这样排下来。当然不是。我试图描述的是这其中认真应对的种种努力，但这个要在他们的作品里才真切看得到。

问：你怎么看朱天心、朱天文对这个问题的应对？

唐诺：阿城讲朱天心最大的特质是从来不闪，头破血流也要正面攻过去。我当初对天文的批评就是她会绕，因为她的小说技术太好了，一滑就过去了。就像张爱玲当年的小说，现在再看，没有正面处理，是用文字盖过去了，骗不了人的。天文和骆以军都有这个麻烦，文字太华丽，久而久之没有困难存在，大家越读越甜美。但这个对小说家来说有风险，当社会觉得你最完美或者怎样，通常你已经遇到很大的难题，你可能在这个里面停留太长时间了。

博尔赫斯通常写完一个题材就走，所以他会成为作家的作家。他开发一个领域，自己不停留，后面的人跟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魔幻现实，大家都尊敬的不得了，解放了一代人。他下一本呢，《瘟疫时代的爱情》，最传统的手法，最小的题材，你们写十年的爱情，我写一个七十年的爱情给你们看。

当年有人讲毕加索的画，说冲决一个形态出来的第一个作品通常是丑陋的，因为它的任务是冲开那个限制，姿态可能会很难看，之后才会慢慢修得完美，才有美学的余韵。天心有些作品有点头角峥嵘，因为撞击的时候难免用力过猛，或者姿态不是那么自然。天文的小说不会这样，整体晶莹剔透，像个刺绣。她后来自己意识到这个，所以在《巫言》中有点有意破坏自己的文字美学。她这么流线的文字，任何礁石都可以一个侧身闪过，而且姿态非常优美。但即使这样，也要正面对台湾



书写的现实和困难。他们没处可躲。

问：相比之下，大陆作家有处可躲，也许使他们更难正面进攻过去。

唐诺：文学的转身比较接近于船而不是汽车，不是简单地说，师傅，错了，掉头吧！它需要回身的余地。尤其过去小说处理越是丰厚真实，转身就越困难。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很怕换写作方式换信仰比换手套还快的人，这说明过去的东西不是以命相搏。某种程度我不敢那么倨傲的要求莫言王安忆的转身，就算不成又怎么样？他们还是在认真书写他们那一代的东西。了不起就是他们没有给我们更多东西，某种程度也可以心平气和了。

我们认识王安忆比较早，当时大陆作家群整个还没起来，天心就在国际会议见到她。她觉得王安忆衣服提袋都很拮据，很心疼她。当然我们后来就知道了，现在是台湾作家都衣衫褴褛，大陆光鲜得很，所以，善恶有报，世界是公平的，哈哈。不过天心也有这个自信，所以在香港书展说，我们衣衫褴褛，但是我们军容壮盛。

这是阿城的比喻，他说军容壮盛不是说铠甲都是新的，而是都是补的，因为铠甲一块块可拆解，坏的时候立刻补一块，最后变成像伤疤一样光荣。你看一支部队一块新一块旧，就知道它打过多少仗，比满城尽带黄金甲更有震撼力。李世民的黄金甲绝对不是光鲜的甲，可能只是右前臂的一小块是金色的，因为要指挥号令。当他把手举起来，大家知道统帅在哪里。如果大家都是黄金甲，那不知道要听谁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首领要躲起来，就是曹操割须断袍的意思嘛。

台湾下一代很差，但是三五年之内可能还对几个城市有意义。未来它可能会荒败，像一个矿工城市，挖完矿大家都走了，只剩下关门的酒馆和废弃的矿坑。但夸张点讲，我认为这一代的书写造就的位置已经在文学史上确立，台北已经可以作为华文世界的历史名城了。

图 1 为唐诺和朱天心；图 2 为加西亚·马尔克斯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网易 博客

blog.163.com  
新锐人文生活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主页：<http://chinairr.com.cn/>